

記憶

REMEMBRANCE



要文斗!
不要武斗!!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3月31日第3期 总第18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81期

地方文革研究专辑（一）

目 录

【编者的话】

家有三件事，先从紧上来：地方文革史是当务之急 2

【专 稿】

萧 宏 广西文革——解码“七二五讲话”幕后真相 3-53

【评 论】

钱理群 从地方文革看文化大革命 54-84

——读《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

【书 讯】

续霜红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出版 85-86

【文 摘】

朱 竞 赵瑜和他的《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 87-89

【编读往来】

1. 80后、50后、30后及外国学者谈纪念李宇锋 90-93

2. 老赵谈“方答读者” 94-95

3. 越人提议刊发简短书评 95

4. 宋翔雁希望为回忆录提供平台 95-96

5. 眉间尺介绍美国总统图书馆的文革资料 96-97

【本刊声明】

【编者的话】

“家有三件事，先从紧上来”。文革研究最要紧的是地方文革史的编写。如果从中学老三届算起，文革亲历者的年纪都在65岁以上，作为研究的主力，这些人将在十年后退出大半。这十年是关键十年，地方文革史应该是亲历者为后人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大凡历史研究都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二个层面是剖析其中的思想文化及对后世的影响。相对而言，亲历者的优势在第一个层面，非亲历者的优势在第二个层面。

严家其、王年一、金春明、席宣、杨继绳，民间与官方的文革通史出了好几部了。分卷本的通史也有了。现在的重点应该转向地方文革史。王年一说，研究文革者有两类：一类是“眼睛向上派”，一类是“眼睛向下派”。“向上派”多做宏观研究，“向下派”多做微观研究。地方文革属于“眼睛向下派”。向上的研究越来越困难，向下的研究空间较大，禁忌较少，是国内的强项，也是亲历者最容易进入的领域。29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地方（辽吉黑甘宁新藏）是没人开垦的处女地。

就写作而言，地方文革史的第一步是先编写大事记。我写内蒙文革的时候，就是先从大事记做起的。这个经验可以放之四海。有人会说，等我把资料搜集全了，把事情考证准了再写。我的经验是，资料永远也搜集不全，事件的真实性、准确性会永远论证下去。明智的办法是，先把大事记编起来，随时补充修改。有人会说，我生活在县里，对城市文化很陌生。我的回答是，地方文革史首先是政治史，是运动史，是各种势力的斗争史，都市文化是第二个层面的事，那不是第一代地方史的任务。

要对自己、对后代、对学术负责，但是，也不要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我们只是开个头，铺个路，打个前站，奠个基础。它不可能完美无缺，不可能面面俱到。重要的是，把事情做起来，从现在开始！

2017-2-16

【专稿】



作者简介：

萧宏，特约撰稿人兼文革研究者。1962年生于广西柳州。父母出身大资产阶级，年轻时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因其亲人多在台湾，文革伊始，父母遭殃。少小离家，有幸见证了1968年的柳州武斗。所从事职业：专业水球运动员、卡车司机、记者、北欧导游。

广西文革解码

——“七二五”讲话幕后真相

萧宏

一、南宁大火真相

本文所说的“七二五讲话”，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7月25日《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

时间是在7月25日凌晨1时5分至6时1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接见并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谢富治（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黄永胜（总参谋长，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这次讲话当年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

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作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影响极广。

虽然这个讲话只是针对广西一个地区的问题而作，但却成了对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起着非同寻常指导作用的“重要指示”，是文革造反运动终结，造反派走下历史舞台的标志。

（一）标志文革造反运动终结的“七二五”讲话

1968年夏天，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是全国造反运动终结的标志。“七二五”讲话公布，开始落实；7月27日，毛泽东指示北京市革委会派遣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结果发生冲突，造成5死731伤的严重后果；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和中央首长接见并警告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直接用“国民党”、“镇压”这样的字眼把他们从精神上搞垮，几乎如同秋风扫落叶。曾几何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倚仗的”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1968年，这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造反派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历史垃圾。这其中又以韦国清调动部队和广西“联指”武装屠城、围剿南宁广西“四二二”最为惨烈。

在长达五小时零十分的会议上，中央首长的讲话充满了对“四二二”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代表讲话中少有的。

当康生在讲话中第一个点名要“四二二”派的朱仁（自治区党校教员）站起来时，首先就来了一通“下马威”：“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¹

接着周恩来也说：“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

（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

¹ 谢王岗，原名谢祖祐，又名谢晖鲁、黄岗。广西合浦福旺乡石碑口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参加革命，原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曾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因支持广西“四二二”而遭致韦国清的派性镇压，谢王岗、袁家柯（南宁市委副书记）被康生点名扣上特务和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后，关押了十年时间，迟到1984年“处遗”方得平反，恢复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在随后对“四二二”派其他代表的逐一点名指责中，也大多是这种不容分辩的、大帽子乱飞的训斥口吻。比如，说到南宁大火时，有这么一段训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话：

周恩来：“你（指朱仁，自治区党校教员）不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7月21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¹



讲话中，对“四二二”派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周恩来、康生等人更断言“四二二”已经被所谓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所控制。

我们再来看看当

图1：部队和“联指”炮击之后的南宁朝阳百货大楼。时亲历会场“四二二”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之一的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

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

¹ “七二五”讲话，是1968年7月26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办公室（广西“联指”）记录整理印发各地学习。此引文据原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嘉陵印刷厂105红印兵团翻印的版本。

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¹

1. “七二八”毛钦定“四二二”放火

南宁大火的责任，到了1968年之夏已成定局——迫于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官僚集团的联手施压，毛泽东决定抛弃造反派。换言之，“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所以毛泽东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的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放任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2. 毛泽东用“国民党”、“土匪”、“镇压”等词语警告造反派

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即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韩爱晶、地质东方红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对“南宁大火”直接用“国民党”、“土匪”、“镇压”等词语来警告。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¹ 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华夏文摘》增刊第388期。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泽东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¹

上述这个毛林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牺牲造反派的经典桥段，形象地诠释了毛依靠军队抛弃造反派的实质。

1968年夏，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七二五”讲话，以及标志造反派走下历史舞台的“七二八”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二）南宁大火——广西的“国会纵火案”

所谓的“南宁大火”完全是参加屠城的解放军和“联指”炮击及抛炸药包所致。“南宁大火是‘四二二’搞的”，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是韦国清一手炮制的，中央钦定的颠倒黑白，使这一事件成了广西历史上的“国会纵火案”。

1、“七二五”接见前后的两场“南宁大火”

以“七二五”的接见为界，“南宁大火”分为“之前”和“之后”两场，或曰两个阶段。致使“四二二”灭顶的的大火，是指责造反派纵火的“七二五”接见后才发生的。

“南宁大火”主要分布在部队和“联指”进攻的“四二二”的控制区域——西城区旧城一带，以及“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的船只。

“七二五”前的“南宁大火”有三处：“四二二”的控制区域居民区大火、南宁（朝

¹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的三三一期。

阳) 百货大楼大火、“联指”三次炮击邕江船只大火。

由广西军区组织部队参与围剿，各县人武部具体执行的这场大屠杀，使全国文革期间任何一场杀戮都相形见绌。由于以毛泽东“群众专政”为根据，由部队出马上阵，“联指”派成员执行屠杀任务。即捕即杀，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而“四二二”造反派的悲剧还在于，他们误读了毛的文革战略思想——伟大领袖让群众起来，大造走资派的反，其真实目的是把党内斗争扩大至全社会，用民粹主义情绪煽动百姓，代他打击党内反对派，不过借刀杀人而已，丝毫也没有为百姓伸张正义、反对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还民众以公平民主的意思。民众造反替毛收拾了反对派后，他就卸磨杀驴回过头来收拾造反的民众。谙熟伟大领袖的文革方略的韦国清，效法当年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炮制了“反共救国团”和“抢夺援越军用物资”等假案，从毛手上取得“尚方宝剑”，去剿杀那些天天还在高唱《“四二二”战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造反者。

(三) 南宁大火背景

南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边陲古城，古称邕州，简称“邕”，碧绿的邕江穿城而过。历史上的南宁属百越领地，自古以来，南宁就是中国南部著名商埠和主要物资集散地。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南宁市成为自治区首府。

说到“南宁大火”，这就牵涉到两派的控制区域，“联指”在城东新城，“四二二”在城西旧城，这种大院与陋巷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诠释了庙堂与江湖的对立。

1. 保皇与造反、江湖与庙堂的对决

文革期间，一省之首府城区一分为二，楚河汉界，两大派各据一边，这可能是全国唯广西所特有。究其缘由，这又是与建国后南宁的特殊城市格局有关，南宁的城区一大特点是政府机关区和市民草根区是泾渭分明的。

城东是政府区，马路宽敞笔直、路边绿树林荫，各个政府机关的办公楼与干部宿舍都

在高墙环绕的大院内，自成一体，里面大小楼宇映掩在绿树花丛之中，宛如别致优雅的园林庭院。而城西则是民国时期“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群居的旧城区，那里的居住环境则是另一番的景象，逼仄的巷道内，到处是随风嘎吱嘎吱作响的木板房。马路弯曲狭窄，还有不少路面是凹凸不平泥地，到处污水横流，而市民居所多为破旧简陋砖木结构房子，还有不少还是木板房，屋内光线昏暗、空气混浊，且一家独居一屋的甚少，以多个家庭挤迫蜗居于大小不一的杂院之中的居多。这些居住于环境恶劣的“平民区”的市民，除工厂商店的普通职工外，还有小商小贩和下层的体力劳动者，如拉木车、赶马车等搬运工和一些靠挑泥方（工地余泥）为生的无固定职业者。

广西首府南宁的城市布局以物化的形式，毫不掩饰地显露了以党政官员为主体社会群体所享有的特权，自然引起了长年累月居住于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旧城区的普通平民群体内心的愤愤不平。这些艰难度日的下层市民平时远离政治，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他们对“四二二”的同情和支持，并非出于对文革的热情，仅是一种痛恨社会不公的群体心理的本能反应，所以他们当中多数人没有直接参加到派组织中来。即使这样，他们却因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 “解放区”令韦国清如芒在背

1968年的南宁，已然杀机四伏。虽然南宁市革委会在4月13日成立了，但两派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其原因是南宁市革委会实际上是偏向于保守派“联指”一方的，这就遭到“四二二”造反派的反对。在此种情况下，市革委会和区革筹、广西军区对待两派不能一碗水端平，而是重复了1967年时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这就进一步激化了两派的矛盾。“四二二”抵制革委会的错误，批评革委会，“联指”和革委会的领导们认为这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要求与之坚决斗争。由此，两派的矛盾和斗争就急剧加速了。

广西“四二二”派的确是激进的造反派组织，他们认为不平等的事必欲拼死抗争。面对“联指”派的强大压力，他们就把人员集中在文化大院、展览馆、水电厅、医学院、广西大学、百货大楼及新华街、解放路一带，以应付突发的事变。此时，南宁周边各县及广

西其他来到南宁逃生的“四二二”派人员，也住进了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一时成热闹之地。

尽管南宁“联指”有区革筹、广西军区及周边各县人武部和“联指”的支持，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有丰富的物资供应和广大的后方根据地，但对“四二二”的各据点一时也无可奈何。此时的“四二二”各据点内是一片热闹的景象。特别是在新华街、解放路一带，号称是南宁的“解放区”，这里社会秩序良好，经济生活正常。



此时的广西，除南宁、柳州、桂林三座城市外，广西各地、县的“四二二”不是被消灭了，就是已被围困即将被消灭。只有少部分人逃出来到了这三座城市。

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广西“联指”将“四二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投鼠忌器，一直没有机会下

图 2：1967 年 4 月 22 日南宁市朝阳广场“四二二”成立大会。手。毛及中央文革对广西“四二二”的日益疏远和抛弃，给了他们下手的机会却还没有名正言顺的屠杀借口。毛中央在 1968 年颁布的“七三”布告，以及针对两广造反派的“七二五”讲话中，以“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钦定了两广造反派的罪名，为韦国清提供了下手的机会。

3. 韦国清为屠杀大造舆论

韦国清于 4 月 26 日在革筹小组接见南宁三代会、两大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会上的《重要讲话》（上午 9:30 时至下午 2:20 时）就是杀气腾腾的：“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最后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就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就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就是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所以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打击这些阶级敌人，就是白干了两年”，“广西地处边防，是援越抗美的最前线，又是解放前国民党

桂系军阀的老巢，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有暗藏的特务、叛徒，有残留的桂系军阀残余，有钻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两面派，有地、富、反、坏、右，他们干尽了坏事。我们要擦亮眼睛，把这些坏家伙揪出来示众。”

有一段话简直是韦国清 1968 年大屠杀的自画像：“广西有一批人过去血债累累，有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在文革中有的赤膊上阵，妄图篡党、篡政；有的幕后策划，煽动分裂，制造事端，挑起武斗”，“一切阶级敌人，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进行垂死挣扎，我们要和他们作殊死的斗争”，“对阶级敌人，不断地、主动地打进攻仗。对敌人我们绝不能手软，或者犹豫不决，要猛烈地向敌人进攻……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要看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很疯狂，但我们一点他，他就会粉身碎骨。”

根据韦国清的指示，广西日报 1968 年 5 月 17 日刊登了各军分区、地区革委的负责人讲话，口径和韦国清上述讲话一样，都是要“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广西《联指报》4 月 30 日发表“外省五人”的万字长文，更是杀气腾腾：“警告阶级敌人，不许轻举妄动，否则自取灭亡”，“不见棺材不掉泪，对待反革命暴动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主动对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

4. “杀人九论”

1968 年 7 月 11 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发》。从即日起至 8 月 3 日，该报发表九篇社论，名为鼓动镇压“阶级敌人”，实为煽动屠杀“四二二”和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托派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因此，这九篇社论被称之为“杀人九论”。¹

从此，全广西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

¹《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 年》，第 93 页，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 年编印。

台风，从城镇到农村，成批大规模地屠杀广西“四二二”及“五类分子”。

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以响应中央“七三”布告为名，从7月至8月对广西造反派进行了血腥残酷地杀戮，导致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

广西造反派宁死不屈，于是在广西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就上演了“围城”之战，一旦“破城”，任意屠杀，不但杀戮抵抗者，还残杀放下武器的俘虏，甚至屠杀伤员俘虏，对被俘的女红卫兵进行轮奸。真正的残酷是针对无辜。与此同时，还大规模屠杀无辜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亲属，说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伙。

广西大地，尸陈遍野，二十万民众，生灵涂炭。

（四）密谋部署

1968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宁警备司令部戒备森严，在此召开的南宁警备区党委扩大会议。宋治平（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警备区司令员）、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警备区政委）、邱玺（副司令员）、慕石起（副政委）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区展览馆、朝阳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从独立一、二师、警卫团、南宁军分区、警备区调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近万武装，觉得还不够，决定再调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九个县的“联指”力量参与围剿广西“四二二”，并划定兵力部置的位置。

1. 贯彻“七三”布告武力攻打解放路

1968年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对广西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列举“破坏铁路交通”、“抢援越物资”、“抢解放军武器”、“冲击军事机关”……等为反革命事件。布告还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七三”布告发出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利用

“七三”布告，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动解放军和十多个县的民兵及广西“联指”的武装，联合进攻“四二二”最后剩下的百货大楼、展览馆、解放路等据点。

为了执行“七三”布告，以韩世福为首的南宁市革委会经过研究后，出动了五千多人的宣传队，开办了六百六十多个学习班。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七三”布告，还出动飞机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一派群众组织的据点散发“七三”布告，号召住在上述据点的群众撤退出来，但又不给人身安全的保证。当时市革委会副主任肖寒曾到西郊片召开的3万人大会上公开要求派出解放军和“联指”武装，在“军民团结起来，掩护革命群众救火，强行收缴武器”的名义下，向“四二二”的上述据点进攻。



图3：韦国清调动部队南宁屠城

在攻打解放路时，总指挥是广西军区分管作战的常务副司令员焦玉山，指挥所设在金丝巷内。参加围攻的部队有6912、6966、6936等部队；广西“联指”的武装人员及广西军区从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市郊区等地调来的

民兵团。各地的民兵团先在南宁饭店报到，然后听从市武装部副部长沈如环的指挥。在攻打的过程中，广西军区的韩世福和副参谋长张海波、景伯承、钟生栋、南宁警司的宋治平、印玺、陈德华等领导干部，市武装部沈如环及慕石起、于德泉、市革委会副主任肖寒、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胡庆辉等人，都亲临前线视察、指挥。其中，张海波、景伯承、钟生栋到各片的前线指挥所指挥作战；印玺在民生路、新华街指挥；陈德华在和平菜市指挥；6912部队政委姜铭海坐镇南宁指挥。此外，还从钦州调来三门战防炮，从玉林调来两门战防炮交给南宁警备区的部队攻打解放路。攻打时，由军区作战处副处长、警备区警备科副科长甄志明担任作战参谋，阎光彩也参与指挥活动。¹

2. 密锣紧鼓部署武力解决“四二二”

“七一五”大会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责成南宁市警备区用武力解决“四二二”占领的区展览馆和解放路。南宁警备区立即召开党委会，由司令员宋治平、政委韩世福作了传达研究贯彻。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广西军区参谋长、南宁警司常务副司令印玺、警司常务副政委慕石起、政治部主任魏连和、保卫科长王国典、治安科长常庆云、秘书科长陆儒丰、管理科长刘益民。当时的分工是：部队的调动由印玺和陈德华负责；慕石起负责后勤保障，并掌握部队的思想情况以及后事处理、收容等工作，魏连和留守机关。会后，慕石起立即在警司的全体指战员会上作了动员讲话。

7月15日下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在区人民政府大楼召开了留在南宁的常委和部分分片指挥员会议。到会的有“联指”副总指挥姜占德及常委杨录、董文林、李世润等人。会上，颜景堂传达了广西军区的指示，研究了攻打解放路等据点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分工，决定成立前线总指挥部。同时把全市分成朝阳、西郊、河南、卫东、延安、红卫、北郊7个片，各片也成立了指挥部，并确定了各片指挥部的负责人和参加攻打解放路的兵力。会后，由广西“联指”副总指挥姜占德将“联指”常委会关于研究攻打解放路的情况

¹《南宁市文革大事件》，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8月，第26页。

向广西军区欧致富司令员作了汇报，得到了欧的同意，欧并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前线总指挥部地点设在南宁饭店。由颜景堂任总指挥，姜占德、杨录任副总指挥，指挥部的成员有李世润、董文林、席庆林等人。具体分工是：颜景堂、席庆林在总指挥部负责指挥，姜占德负责指挥西郊片；杨录负责指挥朝阳片；李世润负责指挥河南片和保卫邕江大桥；董文林负责指挥和平菜市到火车站一带。后来攻打时，姜占德与杨录互换了指挥位置，杨录到西郊片，姜到朝阳片。

在总指挥部出谋献策的有：阎光彩、段纯和、王恩厚、白金友、扬亚录、曹德春、徐树海（冻肉厂）、李松峰（橡胶厂）等人。¹

接着，各地的“联指”纷纷汇集南宁，准备消灭广西的最后一批“坏人”。人们看到，在广西军区独立师的指挥参与下，火车站也调来大炮，炮口对准“四二二”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七月的骄阳似火，炙烤着这座遭难的南国古城，炮手们一遍又一遍地擦着炮弹，他们已经等不及了，纷纷请求允许开炮，人们根本分不清谁是解放军谁是联指的武装人员。

7月15日下午，邕江南北两岸只见人群车炮往往返返，无数白色安全帽和钢盔闪烁发光。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近万武装向广西“四二二”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推进了包围圈。军队和“联指”的高音喇叭已经开到最大的限度，震动整个南宁，大军压境，屠城一触即发。似乎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五）“南宁大火”与部队炮击和“联指”轰炸

1. 脱不了干系

在1968年大屠杀中，广西“四二二”赖以栖身之地遭到部队和“联指”的重炮射击、炸药包轰炸，然后是放火焚烧、泄洪淹没，变成了一片片的断壁残垣废墟。有些无辜的居

¹《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26页。

民惨死于解放军和“联指”的狂轰滥炸之中。当时，参与围攻“解放区”的“联指”各县民兵中的钦州民兵，他们从援越抗美的部队中学会了用小炸药包送大炸药包的轰炸技术，即文革密档官称“三二〇”爆破法。从1968年6月开始，就经常向“解放区”盲目地发射巨型炸药包，炸死炸伤的平民达几十人之多，且基本都是无辜的居民。

“七二五”前的“南宁大火”有三处著名的大火：“四二二”的控制区域居民区大火、南宁（朝阳）百货大楼大火、“联指”三次炮击邕江船只大火。

官方历史和个人记忆有着很大的不同，远没有亲历者的记述鲜活。私人回忆文章里有很多掀开遮蔽的意义。

让我们从众多的民间记忆摘取两例来还原当年部队炮击的惨状。

2. 程郁眼中的部队炮击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程郁当年是十一岁的小学生，随母亲在1968年武斗时逃离“联指”一方控制的单位大院中的家，躲入“四二二”派占据的南宁旧城区部份街区——解放路一带。在“四二二”的“解放区”被“联指”和解放军武装包围和攻占的过程中，小小年纪的程郁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然后是举起双手当了“战俘”，与妈妈一起被关进所谓“收容所”的集中营长达数月。她的记录真实地还原了解放军炮击屠城的场面：

在解放路住了一个多星期。某个晚上大炮响起了，楼上的学生连滚带爬地躲到我们房间，女生说，“吓死了！吓死了！”枪声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近。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总攻，攻击者不仅有“联指”的民兵，还有众多广西军区的正规军，炮弹都是真正的炮兵打出的。我在战争小说中读到的炮声，这回亲耳听到了，果然先听到“呼呼”的呼啸声。接着传来“轰轰”的巨大爆炸声，一些炮弹并不只打据点，常常会落到居民区来。炸到之处很快腾起一片火光。那时南宁老城区多是解放前留下的老房子，大部为木结构，两到三层，所带骑楼使街道更为狭窄，炮火下极易着火，夜空中这里那里腾起大火我吓得发抖，钻到

母亲怀里，她能做的也只是拍拍我的背。

战后，南宁的中心区即解放路一带变为一片焦土，百货大楼也大半坍塌。小学奉命组织学生去参观，老师指着炸毁烧焦的废墟说：“看！那都是‘四二二’烧毁的！”讲解员甚至对小学生说“四二二”的人如何淫乱之类。我在心里说大楼是被“联指”与解放军的大炮炸毁的，民房就是那些炮火点燃的；我也见过那些男生与女生，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曾是那么阳光与天真。当然，当时我绝不敢吭一声，更不敢说我曾从那儿走过。龙应台说，她23岁时读近代史原始资料，才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的”。¹然而，1968年我就知道了，那年，我11岁。²

3. 七尸八命狗沉冤

现摘录当年石巷口炮击幸存者黄吉凤的回忆文章《七尸八命狗沉冤》，作为“四二二”的控制区域居民区大火真实的历史佐证：

1968年6月的南宁，全城被一种莫名的战争恐怖笼罩着。按当时的说法是，支持韦国清的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指”，对支持伍晋南的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四二二”进行武力围剿。当时两派分歧的焦点，表面上是集中在支持掌有广西党、政、军实权的韦国清或支持没什么实权的伍晋南的问题上。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导致了一场血腥的战争。

战争之前，“四二二”占据了南宁市的老城区及老城区内的商业街区，主要为解放路，民生路，兴宁路，当阳街，新华街，高峰路，西关路，布新街，水街，南宁百货大楼，及当阳街至水街的邕江河北岸一带的街区。老城区的主要居民多为平民百姓。我家就在邕江

¹ 龙应台：《不相信》，《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2日。

² 《我眼中的广西文革》，作者程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

河北岸的石巷口。

战争一开始，联指就对“四二二”占据区实行了全面严密的封锁，进出“四二二”占据区的道路出入口，均设检查岗哨，严查出入人员。后来，就开始响起了零零星星的枪声。住在“四二二”占据区的居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照样过着他们的生活，包括我的一家人。不过，就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能躲到那里？我们家的一大家子人，就那么一间，一个人走动，全屋都咿呀作响的木屋。

一天早上，从梦中醒来，就听到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大家都知道是“四二二”“占据区的边缘，又发生战争了，而且不时还听到轰轰的爆炸声，听街坊邻里说是联指开始攻打“四二二”“占区了，攻打“四二二”“占区的武装人员不是南宁市的联指人员，而是市郊及邻近几个县的农民民兵和解放军。这些民兵和解放军，不但有枪，还有炮，有土坦克，还会用小炸药包把大炸药包准确的送到对方阵地去炸对方。但枪声及爆炸声听起来还是离石巷口蛮远，大家除了惶惶恐恐地谈论外，根本不去想这场战争会对街坊邻里的老弱病残及孕妇带来什么危险，只认为是给日常生活上带来许多不便而已，谈论后，还是该干嘛的干嘛，该煮饭的煮饭。

中午时分到了，我们一家子九人，围在与街巷只有一木板墙之隔的家里吃饭，此时，外面的枪声炮声时而密集时而稀稀落落，且又时远时近。对这一切，大家似乎是惯了还是麻木了，谁也没有一点表情表露，只是夹菜、吃饭。吃完饭的大哥正和家住对门的一位绰号叫“瘦姨”的阿姨聊家常；一个只有7岁大的外甥就跑到门口去和我家养的一只小狗戏耍。

突然一声巨响，只觉一阵气浪猛的推了我一下，我眼前一黑，瞬间昏蒙过去。当我稍有意识时，我的第一本能反应是爬起来向爆炸声源的反方向跑，当我冲出硝烟，跑进后屋的厨房，再回头看时，硝烟还未散尽。但却可透过朦胧的硝烟，看见人们躺满一地，随着硝烟慢慢散去，有些人也慢慢的爬了起来，而我已有四个月身孕的大嫂，我外甥的爸爸，还有“瘦姨”是再也起不来了，我大嫂的头被炸破了，任凭我大哥怎样呼唤，她都没有一

点儿反应。死去的已经死去了，但活着的人里却未发现我那7岁大的小外甥，大家一面呼唤一面找，才发现小外甥和那小狗已被炸到身首四肢分离，连尸都找不全了。

就在我家惊魂未散时对门的两家也分别传来了噩耗，同一颗炮弹（或炸药包）的轰击下，对门的一家死了两姐妹，另一家死了一男主人。到这时，石巷口的居民们才意识到，死亡一直在威胁着他们，此时，他们才相信，联指一方是会将他们作为反对韦国清的人而对他们进行屠杀的。他们觉得好冤。就这事后，他们就这件死了七个人，去了八条命（一个有四个月的腹中生命），还死了一只小狗的事，作了个小结，叫作“七尸八命狗沉冤”，算是对死者的悼念，亦或也算是为石巷口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¹

（六）人民军队炮击人民

部队炮轰广西“四二二”过程中，有一细节故事值得一说。

从7月15日起，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在邕江北岸南岸构筑炮兵阵地，21日上午9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27日，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经过半个月炮火的狂轰滥炸，广西“四二二”盘踞的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区域陷入一片火海，只剩下了断垣残壁。

1. 南宁屠城的著名地标——新华路水塔

1968年夏，是韦国清调动部队南宁屠城最血腥的一段时间。在8月3日的武装进攻中，部队设在新华路水塔脚等地的多门迫击炮向着解放路等目标猛烈轰击，炮弹甚至落到解放路以外的地方，一些民房因而起火。

¹ 新浪“广西文革研究专题”微博：广西文革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应。

在部队炮击强大火力攻击下，“四二二”“工总”的头头熊一军等一大批人只得从据点废墟出来举手投降，地点是解放路小花园。6972部队的赵营长，率战士驱赶“联指”杀俘虏的众徒，将头部受伤的熊一军护送到新华路水塔脚下的中医院三楼救治，熊一军扑通一声跪在赵营长面前，说炮击已造成“四二二”人员死伤无数，里面已完全失去了抵抗力，苦求他停止炮击，此时炮声仍在隆隆响，轰击还在进行。



当赵营长从熊一军口中得知解放路里面的惨况后，立即叫通讯兵传令停止炮击，于是炮击停止。赵营长在其管辖地有效地制止了“联指”滥杀俘虏，他对士兵下令：“对不听劝阻越过警戒线去打杀俘虏的人，可开枪制止！”¹

图4：南宁屠城后“联指”押解“四二二”俘虏。 枪制止！”¹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赵营长只是奉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司令员欧致富之命的执行者，但他果断停止炮击和制止“联指”滥杀俘虏，在那疯狂的年代是良知尚存的举措（据说在1983年文革“处遗”时，他为此还得到中央工作组的表扬）。

（七）官方记录的南宁大火

1. 《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记录：

8月3日，解放军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炮击，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为期不远。但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是日给中央的电报说：“阶级敌人”仍然纵火破坏，解放路的坏人不断向“掩护”部队和“救火”的“群众”开枪射击，破坏救火，部队正积极组织设法深入“掩护救火”，严防“阶级敌人”继续纵火。²

¹ 新浪“广西文革研究专题”微博。向明：熊一军采访录之一。

²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126页。

据1983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设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烧毁化工、轻工、手工业的厂房、门市部八十多间，中小学校十五间，医院门诊部八间，百货、医药、烟酒、水产、蔬菜、服务公司的商店和门市部共六十一间。¹

8月1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的电报。电报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攻打、炮击、爆破对方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扔汽油瓶（用棉花引火），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三十三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罪行强加于广西“四二二”一方。²

2. “前南宁大火”

7月15日下午事先布防在邕江桥两头的炮兵部队和“联指”武装猛烈炮轰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

7月15日广西“联指”开始攻打解放路外围据点百货大楼。攻打前，由姜占德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联指”指挥部的意见。攻打时使用了炸药包、土坦克、无后座力炮、火箭筒等武器，炸百货大楼是部队提出来的，炸药是警备区给的。在讨论此事时，广西军区的韩世福副政委在场，他提出“不要把百货大楼都炸坏，留个空，好教育全市人民。”攻打时，韩世福还与市革委副主任肖寒在市革委会院内隔墙视察。8月1日攻下百货大楼。³

7月16日，从中午十二点至晚上，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

7月17日，广西军区炮轰解放路一带，致使永明街、汉乐街、上国街、自强街、灭资

¹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131页。

²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132页。

³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26页。

路、民生路的商店、民房起火燃烧。¹

7月21日上午9点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²

27日，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³

28日 军队和“联指”包围攻打炮轰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致使这三条街道民房起火。⁴

经过半个月炮火的摧残，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朝阳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阶级成分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近二十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就是这些居民点也难逃炮兵部队和“联指”武装猛烈炮轰，而变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

当然，“南宁大火”也有进攻和防守双方互掷燃烧瓶“而燃烧民房、商店”。但都是局部小火，非部队炮击所引起的大火所能比肩。

3. 有关南宁大火的几大谎言

韦国清一边明火执仗，炮轰民居，一边倒打一耙，谎报军情。

7月16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7月19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

¹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98页。

²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104页。

³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110页。

⁴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110页。

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同时，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¹

7月18日，区革筹、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及广西“联指”数千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后，停泊在民生码头的船队被“联指”炮击焚烧，“四二二”驻守的几条街道被“联指”和部队炮击起火，另有几条街道是双方交战时互相投汽油瓶而燃烧民房、商店。但区革筹、广西军区竟把纵火罪责强加于“四二二”一方。竟向中央、中央文革、广州军区发出《严防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纵火事件的措施的报告》的电报。

电报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从15日到18日，先后在新“四二二”控制的永民街、汉乐街的民房烧了大部分。停泊在民生码头的驳船被烧三十余艘。解放路与新华街交界处几十家商店被烧，灭资路银行、妇女儿童百货商店、冰室、三合馆、朝阳百货大楼已被烧毁。上国街、自强路有几处民房也起火。这次纵火事件绝不是偶然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七三”布告的贯彻落实，据部队“观察哨”发现起火的原因，是有人从新“四二二”据点出来点火和掷汽油瓶烧的，当“消防队”组织“救火”时，遭到新“四二二”据点开枪射击，仅18日中午就打伤三人。（是进攻“四二二”据点被打伤的）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的做法是：一、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公布“阶级敌人”，揭露他们的阴谋，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二、积极做好两派的工作，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拆除路障，恢复交通，上交武器；成立指挥小组，由军区、警司、区、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委、660团等领导同志八人组成。并组织武装机动部队四个连，任务是：

¹《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102页。

(1) 发动群众“救火”，组织部队“火力掩护”，“阶级敌人”胆敢向“救火群众”射击，部队采取坚决措施，保护群众。

(2) 加强联防，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清理外来人员（各地县“四二二”被追捕而逃来的难民），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3) 对邕江桥实施武装保护，严防敌人破坏。¹

7月19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又调二二〇师六六〇团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但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却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的一封信》

同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又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所谓《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指示情况报告》的电报。电报说，由于着火地区都在新“四二二”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

(1) 组织了指挥所，由军区副司令员焦玉山负责（实际上早已指挥包围攻打“四二二”控制区域）；

(2) 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

(3) 已发出了坚决迅速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纵火事件的呼吁书，在全市反复广播，开展政治攻势，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²

当时，广西“四二二”广播揭露区革筹、广西军区如此做法是“既做强盗又做官，既当道公又做鬼！手段何等阴险毒辣！”³

（八）“联指”三次炮击邕江船只

1968年7月17日，部队和“联指”武装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

¹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101、102页。

²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102、103页。

³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97页。

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的船只第三次遭到“联指”的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只中弹烧毁。

广西“联指”第二次炮击船只是6月23日，航运局“红联“攻打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北大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来，即要求“联指”总指挥部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江边向“桂宏”号船只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一门炮来参加轰击，打到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击中“桂宏”、“东风”号船；致使连接在一起的四十多艘船只起火燃烧。

第一次炮击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19时，广西“联指”武斗队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所据守的船只开炮射击，1431号和1404号两艘船内装汽油1426桶共203.6吨，另有航空机油24桶，因中弹全部燃烧。

广西“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船只，共烧毁船只166艘，11380载货吨位，1030载客位，5238匹马力。其中钢质船只64艘，木质船只102艘。当时船舶载有物资3600多吨，全部烧毁。其中汽油、柴油454吨、大米700吨、杉木240立方，辣椒干50吨，药品、药材165吨、薏米172吨、桐油132吨等等。被烧毁船舶和物资总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然而，广西当局把烧毁船舶和物资的责任强加给“四二二”，南宁市革委、南宁警备区和广西“联指”开动宣传机器，宣传广播说“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运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朝，犯下滔天罪行。

又如1967年8月20日“联指”第一次炮击焚烧邕江边的船队后，《广西联指报》于当年8月27日报道：8月20日七时整，在邕江纵火焚烧两艘有汽油、柴油共244吨的船舶，这是广西“四二二”航运“工总”一小撮坏头头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破坏援越抗美斗争，纵火焚烧援越抗美物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滔天罪行。

广西区革委利用清查“五一六”，抓捕了一些“四二二”派成员作为替罪羊。“处遗”

时全部平反。实为“联指”派炮火所击。¹

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密档《南宁市文革大事件》专门辟出一章节详细记录这三次炮击事件。

1. 航运分公司船舶3次被烧的内幕

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南宁航运分公司的166艘船舶先后3次被烧毁。

第一次火烧油船商艘（船号是1431和1404，均系木质驳船）。这两艘油驳船于1967年6月由六景油库装汽油203.6吨、1426桶；另有航空机油4.2吨、24桶，运往田阳机场。后因武斗被迫将船停泊在石巷口码头距邕江桥上游300米左右的江面。8月20日，广西“联指”第6团武装人员（团长是海滨，四中教师；政委是莫有章）在民族电影院楼顶用两挺高射机枪向油船扫射高机弹和曳光弹。两艘船上的12名工作人员于当天下午先后离船。1431号驾长郭全因岸上无家，即带全家7人避到靠近西园江边的1艘装满面粉的2407号驳船上。21日上午9时左右，2407号船被桥头方面的“联指”据点内的武装人员开枪射击，击毙船上高中林的女儿，因枪声不断无法上岸埋葬，只得抛尸江中。下午7时左右，停在河中间的一只船被民族电影院楼顶的高射机枪击中起火，引起两艘油驳同时起火，油桶爆炸，火光冲天，有的油桶爆炸到三、四十米高空，接着油船缆绳烧断，自流而下，经邕江桥北岸第3孔通过，至今桥孔尚有烧成黑色的印记。在油船流向下游时，“联指”武装人员在北岸水上派出所左侧岸仍继续对船开枪扫射。油船着火后，“联指”的高音喇叭立即广播：“‘四二二’匪徒放火烧油船啦！”当时，驻守在民族电影院的“联指”武装人员打电话给“联指”总部汇报，但电话却错打到“四二二”一方去。所以讲了一半就不敢再往下讲了。

第二次火烧“桂宏”、“东风”号船只共40多艘。1968年6月23日，“航运红联”

¹《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整党办公室整理，1987年编印，第98、99页。

攻打“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北大码头。打了几个小时后，要求广西“联指”总部通知河南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的炮兵连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河边的水泵房附近向“桂宏”号打炮，后由于发生故障，又回厂另换了一门。南宁化工厂的梁福有指挥拉炮，梅新华、陈诗文、李毓运、黄似火、梁世武、潘伯荣、贺维立等人在当天下午2时左右把炮拉到河岸边，打炮弹百余发。第2天上午，上述“联指”武装人员继续以三七炮和高机射击，至下午3时“桂宏”号下游附近船只被击中起火，火焰很快蔓延到“桂宏”船上，“桂宏”轮的炊事员江细基不会游泳，同船职工黄廷飞将其托浮水面顺着船与船的间隔漂流到水街附近上岸。

据后来负责打捞和修理船只的负责人易鹏反映：不少船舶都发现有枪炮击中穿孔的痕迹。尤其是“桂宏”号客轮，船身弹痕累累，仅在船头档浪板不到4米长80公分高的地方就有大小弹痕183个，船头左侧水线上处，有一炮弹穿孔，出口处直径约20公分，弹孔直径在30—40毫米的也有10多个；弹孔数量左舷比右舷多。原存下“桂宏”号被烧后的照片，均可证实枪炮击中的痕迹。

第三次船舶被烧是在1968年7月17日开始，“七三”布告颁发不久，“联指”向“四二二”发动总攻，“航运工总”所据守的近百条船只，遭受“联指”武装人员火力猛烈轰击，全部被击中烧毁。

以上三次火烧船只事件，都是广西“联指”火力攻击引起的，船只烧毁纯属枪炮打中起火。

对烧船事件的调查处理，广西当局栽赃“四二二”有组织、有计划的所谓“火烧船舶的反革命事件。”

对此，自治区交通局“处遗”领导小组于83年8月29日以(1983)交处遗字第4号《关于文革期间原南宁航运分局船舶被烧毁事件的调查报告》明确认定：原区党委“清查办”工作组认定的“纵火烧毁南宁航运分局船只反革命事件”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南宁市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于83年调查后也认定：67、68年，南宁航运局船只被

烧毁不是放火烧的，而是被枪炮打中起火烧毁的。¹

二、南宁屠城始末

（一）更惨烈的“后南宁大火”

“南宁大火”的第二阶段，从“七二五”接见，南宁大火起火之初中央首长们义正辞严厉声叱责广西“四二二”，到真正的惊天大火烧起来，邕江上游人为的开闸放水的南宁洪水滔天，广西“四二二”真正陷入灭顶之灾冰火两重天的炼狱境地。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南宁城“水深火热”了，中央反而不吭一声，说明真正的背后“纵”火者就是最高层！

1. 围攻展览馆

7月31日拂晓，广西“联指”又开辟另一条战线，一一攻打展览馆。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背着中央和广州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攻的解放军有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642团高机一连、二连，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



川、贵县九个县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参与围剿。指挥攻打的是邱玺（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慕石起（副政委）、陈德华（参谋长），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15时开始包围炮击。当晚打进展览馆，8月1日凌晨结束战斗。然后将上述部队和民

¹ 《南宁市文革大事件》，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8月。第11、12页。

图5：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展览馆 兵撤出并立即去增援包围、攻打“四二二”的另一个据点解放路。¹

8月1日，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于上午八点结束。打死驻守据点23人，伤5人，“俘虏”470多人。据解放军炮兵第642团事后给广西军区和广州军区的报告提到，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命令，炮兵第642团高机一连、二连协同兄弟部队担任“强行收缴展览馆武器”，主要负责火力压制和牵制“敌人”正面火力，防止“敌人”从正面突围，掩护兄弟部队进馆的任务。从7月31日十五时开始，到8月1日八点结束。共消耗冲（步）枪子弹17672发，轻机枪子弹1814发，四联高射炮枪弹690发，信号弹22发，损坏轻机枪二挺，四联高射机枪一个管机匣。²

8月2日，韦国清（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广西区党委书记）、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七军政委）因为背着中央，调动部队和“联指”摧毁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后，是日，他们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出电报，检讨“错误”。

电报说，“我们对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强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电报还说，“在部队进驻时，他们向部队开枪，我牺牲6人，伤52人，部队还击打死他们23人，伤5人。据初步统计，抓到的470多人中，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反共救国团成员’陈公卓，‘叛徒’林执真，‘走资派’庞真、韦成勋、林超、江浩生等九人。”³

2. 围攻解放路据点

就在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的当天，广西军区命令6912、6966、6936部队组织“武装救火，收缴武器”，派出2000多人的部队，会同九县一郊的武斗民兵和“联指”

¹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12页。

²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24页。

³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25页。

派武装人员，集中力量，围攻“四二二”派的最后占据的解放路据点。总指挥是焦玉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张海波、钟生栋（广西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邱玺（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陈德华（南宁警备区参谋长）等也分别到各片指挥。广西“四二二”原先控制的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上国街、新华街等十二条街道，已被部队和“联指”打成了废墟。¹

8月3日，部队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炮击，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为期不远。但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是日给中央的电报描绘的却是另一幅情景：

阶级敌人仍然纵火破坏，解放路的坏人不断向掩护部队和救火的群众开枪射击，破坏救火。部队正积极组织设法深入掩护救火，严防阶级敌人继续纵火。²

同一天（8月3日），部队和“联指”三面包围广西“四二二”南宁百货大楼据点。先用重机、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轰击，后用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摧毁。据1983年广西“处遗”调查统计，南宁百货大楼被摧毁，国家损失110多万元。³

随后攻打解放路。8月5日，战斗结束。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在向阳路口等地紧急戒严的公告》，封锁以解放路为中心的一大片“战场”。⁴

广西造反派遭疯狂迫害、屠杀、围剿直至全军覆灭的过程，是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和“联指”罗织子虚乌有的“反共救国团”的罪名为肇始，中央“七三”布告的颁布，中央“七二五”讲话对此罪名加以肯定，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武装以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之名，行屠城围剿广西“四二二”之实而告终。

3. 熊一军动员群众撤离解放路

¹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25、126页。

²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26页。

³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27页。

⁴ 《南宁市文革大事件》，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8月。第26页。

据守解放路的“四二二”头头熊一军考虑到这里数万群众的生命，用高音喇叭向解放路的市民呼吁，尽快撤离。“联指”也广播：“革命群众快离开，反革命分子留下来”的促降口号。

撤离的居民，从解放路延民生路到南宁饭店门口接受检查，放行后自投亲朋。大批的居民举着双手被押解出来，甚至伏在母亲背上的一两岁的孩子也知道把双手举过头作投降状。

4. “四二二”枪毙六名“反团”分子

当时，南宁市内两派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均互相指责对方混入了“反团”分子。这天，“四二二”为摆脱“联指”的揭发和攻击，在醒汉街口擅自枪毙陈阜东、覃雄、潘子昆、唐继能、白景光、陆绍禾等6人，其中陈阜东、覃雄是市公检法军管会点名通缉的“反团”匪首，潘子昆系另案的特务头子，此3人当即身亡。而唐继能、白景光、陆绍禾3人未被击中要害，后被人救走，这3人均不能证实是“反团”成员。¹

8月3日，部队和“联指”加大进攻力度，向解放路进行更加猛烈密集的炮火进攻。这里是一片火海，“四二二”的据守人员面临灭顶之灾。

8月4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专、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行动起来，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

此时，解放路的居民已撤走，熊一军率众投降后，死守解放路的“四二二”约2000人，绝大多数是南宁人，有热血的红卫兵学生，年轻工人居多，还有部分不是南宁市的“四二二”骨干人员，他们在当地已上“联指”的“除名单”，有一部份是在当地被“全家抄斩”的脱逃者，避死来投奔“四二二”，所以“联指”上报说“四二二”是地，富，反，坏，右，资的老巢。除部分“四二二”人员外，主要是南宁的“青年近卫军”，“雄鹰”等组织，他们倾向“四二二”，但独立行事，不受“四二二”控制。

¹ 《南宁市文革大事件》，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8月，第27页。

8月5日下午起，“联指”的头头代表指挥部通过高音喇叭发出：“坚决，彻底地消灭“四二二”反革命分子”的总攻令！

在围攻者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下，到8月8日，解放路据点被攻下。当天上午9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四二二”派的“俘虏”出来。当天，“四二二”的广播员、成员共26人，被押到现在的广州照相馆门口，集体枪决。

官方密档还详细记录有“四二二”焚烧钱币事件。

5. 解放路银行50多万元是怎么烧毁的

1968年7月下旬以后，广西“联指”和一些解放军部队因为“捍卫‘七三’布告”，不断地向另一派群众组织的据点发起进攻，并先后攻下了广西展览馆、南宁百货大楼等据点。8月4日上午11时左右，进攻的解放军部队和广西“联指”的武装人员已开始打进解放路。解放路银行右侧理发店已经着火，银行的房顶也被燃烧弹击中起火。广西“联指”的武装人员即将攻占银行。当时参加广西“四二二”南宁市人民银行“革联”解放路办事处战斗队的黄长安、高镜凤等人立即向“四二二”中心片指挥所作了汇报。该中心片指挥所负责人李家庆、黄希立等人出于派性的需要决定，把钱运出去烧毁，不让对方打进来把钱抢走，以免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中心片指挥所的负责人黄希立即带领“四二二”保卫处的武装人员黄耀明、郑峰等人带十字镐去打开金库。中心片指挥所的负责人李家庆还给黄耀明一支五四手枪在现场警戒。

金库打开后，黄希立请银行干部、职工高镜凤、黄长安、刘强、李明军、雷祖佑、石正等6人到现场清点了钞票，共计人民币510,430.60元。银行的人员当场签字作了记录。在银行人员的坚持下，广西“四二二”总指挥熊一军也来到现场当面给银行的人员写了收条。然后，把钱装进4只麻袋（其中3只满袋1只半袋）。“四二二”保卫处的武装人员和银行的职工干部一起将这些钱抬到保卫处二楼，黄耀明也扛了1袋上保卫处二楼。当天下午，“四二二”中心片指挥所的常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把这些钞票全部烧掉。当晚8时许，保卫处的黄耀明、郑峰及保卫处的其他人员分别抬着钞票到指定的地点——土产门

市部后面的球场，把4麻袋里的钱全倒在一堆，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在焚烧时，熊一军到了现场，还用棍子翻火堆里的钱，使燃烧的速度加快。后来，有的人想要钱，熊一军当场作了制止，后因制止不住，也有些人要了些钱。但这些人所要的钱后来在“俘虏营”被搜身时均已被收缴。广西“联指”一派参加攻打解放路的武装人员，在攻打解放路时也发现有这些钱。

在这一事件中，从解放路银行办事处拿走的钞票大部份被当众烧毁，少部份被人在燃烧时及烧过后拿走。但后来有关单位及时地发出了凡有被水浸过、火烧痕迹的钞票均不能流通使用的通告，使这些被拿走的钱不能流通使用，实际上国家财产遭受的损失很少。此次烧币事件成了熊一军（广西“工总”头头）的一大罪状之一，后熊被判死缓，羁押在鹿寨英山监狱。主犯黄长安、高镜凤均被关押看守7年、5年不等。八十年代“处遗”熊、黄、高三人均获平反。¹

1968年7月至8月上旬长达四十天里，于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一幕幕血腥屠戮的人间惨剧——在广西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韦国清，调动军队和“联指”武装，对在首府南宁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规模武装围剿屠杀，解放路一带的三十三条街（巷），被部队炮火轰击打成了一片废墟，楼房大都夷为平地。整个南宁生灵涂炭。据官方统计，“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²

1968年广西大地确实是“一片红”——仅仅是“七三”布告颁布至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³

（二）枪杀、活埋俘虏

1. “联指”杀俘

¹ 《南宁市文革大事件》，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8月，第35页。

²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31页。

³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27页。

8月5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原6912部队团参谋蒙瑞廷介绍说：“占领解放路后，从展览馆、解放路收容的“俘虏”达到了高潮，估计最多达9600多人，这些人分布在文化大院、二中、九中、八中、四中、幼师、桃源小学、交通学校等几个点。展览馆的俘虏主要关在文化大院。管理俘虏总负责人是李瑞祥，其他俘虏收容站的负责人是蓝启生、于德泉、王国典、苏永定、郑善孔等人。

俘虏营的主要犯人都是王国典等人审问。审问中使用了各种刑法。有些俘虏忍受不了虐待，企图逃跑，被枪杀了几个。这9600多名俘虏中，大多数是在解放路一带的群众，有青壮年、也有老年、妇女、儿童，许多人都未参加武斗。也有人是从家里被绑架到俘虏营关押审讯的。当时，这些俘虏中有的被当作敌我矛盾、非法审讯、殴打、关押，有的被枪杀、有的被毒打致残致死。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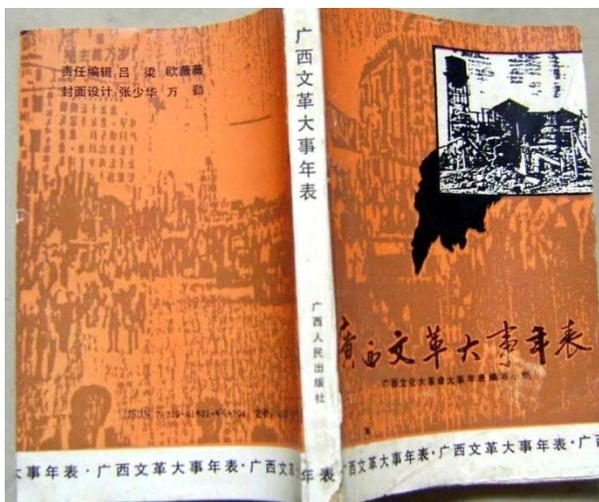


图6：《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1989年5月成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32开，288页（该书发行不久，就以因存在“重大政治问题”下令收回销毁）封面题图就是南宁屠城的著名地标——新华路水塔。

南宁“四二二”的各据点被攻破，“联指”头头们大开杀戒，把抓到的“四二二”人员成批的拉到邕江边集体枪杀，尸体推入河中，鲜血染红了邕江。如筑路机械厂的封方南、

¹ 《南宁市文革大事件》，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8月，第27页。

黎瑞波，水电厅的一蔡姓干部就是被抓获后杀害的。¹

5日下午广西“联指”和南宁市“联指”下属各组织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晚上举行宴会，大吃大喝后，又去屠杀俘虏。南宁市“联指”“财司”兵团分两处会餐，炮连在朝阳路小学，其余在区工商联。在朝阳路小学会餐的王利（南宁市饮食公司保卫干事）等人吃喝后，提出要“教训教训”康兴（南宁市财办副主任）。吕继才、杨爱群表示同意，于是他们把康兴从关押的教室里拉到球场上，王利、吕继才和杨爱群用木棍轮流毒打，当康兴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时，王利、吕继才和杨爱群把康兴拖上汽车，令司机蒙日光开车到望洲岭（现在的皮具厂），把康兴抛下红薯地里，王利和杨爱群开枪将康兴杀害。康兴是1943年入伍的老干部。²

8月6日凌晨5点多，“联指”南宁民运社兵团头头兼攻打解放路武装混合连连长李锦庆，在镇北桥头被冷枪击中死亡。消息传开后，“民运兵团”武装班长黄立胜便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到华西大楼，把关押的俘虏从中拉出八人到华东路口枪杀。³

为图省事，“联指”派执行屠杀任务时往往将“四二二”押到江边，打死后推入江中。一天，武宣县畜牧场场长在柳江钓鱼，见到从柳州方向飘来尸体，十分钟内数了九具。作家秦牧说：广西“大量尸体被绑在木排上，从梧州一直漂流到广东的肇庆等地。”⁴

2. 南宁照相馆集体枪杀俘虏事件

官方密档记载：

（1968年）8月5日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离南宁市革委会门口不到一百米处）被“联指”成员用冲锋枪扫射枪杀，死者中有南宁市公安局干警黄祖霖、钟敬仁、胡跃明、李国和、谢

¹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27页。

²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29页。

³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30页。

⁴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期第92页。

赤德、黄初庚；南宁市废旧公司唐光琮（女）、廖洪基；南宁市粮食局韦质彬；南宁市树木园五人。¹



图7：南宁“广州照相馆”门前广西“联指”集体枪杀广西“四二二”26名俘虏幸存者的记忆弥补了真实的细节

在那场杀俘事件中侥幸捡了条性命的原南宁四中老师（男性，广州籍贯，1938年生人，姓名不详）、在新浪署名“广西文革研究专题”的博客则记录了更多真实的细节——

我本人就亲历了那场大屠杀的，并在“解放区”出来“投降”的路上，我和同校（南宁四中）的老教师吴肯，差点被同校的政治教师、联指武斗一个片的“指挥官”（笔者按：广西“联指”第6团团团长），一个叫海滨的人的拉出枪杀。是年我刚30出头，现已过古稀，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40多年前那场派性斗争获胜一方大开杀戒，滥杀对立派群众和所谓地富反坏右的无辜者的风腥血雨的日子，横尸遍地和血流成河的惨景，不但终未

¹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28页。

遗忘，而且有着一种愈来愈强烈的愿望，要把这段经历诉诸于文，公诸于世。

南宁四中是全市在大屠杀中死人最多的学校之一。

其中二位青年教师被枪杀，他两人与我们一样在解放路躲避武斗，1968年8月5日早上从解放路出来投降。俄语老师覃连光，他比我们先走一步，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当时他被人抓到邕江边枪杀后，尸体推落了江中，另一位死难者是语文老师霍普罗。当时，我们是一起出来投降的，当我们从解放路步入新华街，在水塔脚下，就被我校“三七”的学生抓住。我们几人走至民生路广州照相馆前，遇到了海滨。他手中有五四式手枪，胸前还挂着冲锋枪，他先用手枪重重地敲击我的头部，我头上立即血流如注，随后他走开了，当我们行到市政府门口的马路时，有一个武装人员过来剪开串缚我们的绳子，带走了吴肯夫人彭国英（她是广西中医专科学校的老师），我们三人重回被俘人员的队伍，与大家一样跪地等候上囚车。这时突然枪声大作，后来听说是联指在广州照相馆对面的废墟上枪杀了20多个被俘的“四二二”人员，枪声过后不久，海滨又出现，他站在被俘人员队伍旁边，高声喊叫我和吴肯、霍普罗三人的名字，要我们出来。同时，队伍中的人群开始骚动，大家都往队伍中间挤迫，以逃避联指人员拉出枪杀，霍普罗因而与我和吴肯老师冲散了，就是这样与我们永别了。

后来听说当时海滨点名时他站起来出列了，就在路边被人枪杀，冲锋枪朝他背部打了四发子弹，胸部的鲜血象涌泉般喷出，洒满一地，倒地后又被手枪补了三枪。当时，我与吴老师虽不知霍老师死得那样惨，但被海滨点了名，也觉得在劫难逃了，便开始吩咐后事，我们对挤迫在人群前面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成员、秀田小学老师梁绍建说了各人的家庭地址，请她以后设法把我们的消息告诉家人，梁老师顿时泪流满面地边听边点头答应。

海滨也终于发现了我们两人，喝令我们站起来，正要拉我们出队伍之时，在这生死一刻，南宁市政府里冲出五个解放军，把海滨赶走了，我们总算是死里逃生了。

今年（2012年）初，原来南宁市“教工井冈山”的难友数人聚会，梁绍建老师也在其中。他们打电话给我，互相问好，我与梁老师自1968年几乎是生死之别后，四十多年没

谋面了，我在电话中问她还记得那时的事吗，她说，那里会忘记呀。

前几年，我们四中当年的同事蔡爱梅老师与先生从温州来广州，我们几个调回广州的四中老师与蔡老师夫妇在海珠区滨江路的中海名都茶楼聚会，我与她也是四十年未见面了，我谈到当时险死于海滨枪口之下一事时，她先生说，他正是五个解放军中的一人。他说，那时他在广西军区政治部，攻打解放路时，他被派驻市政府中，广州照相馆前的集体杀俘事发生后，他马上电话向军区司令韩世福报告，韩世福命令他们立即制止杀俘，当他与几个解放军匆匆走出市政府大门时，刚好看见海滨正要强拉我们的一幕，是他们赶走了海滨。

天下之事无巧不成书，当日不相识的救命恩人竟是同事的先生，而四十多年后又偶然相会。我当即向蔡老师的先生救命之恩深表谢意，谈到当年大屠杀和死难的覃连光、霍普罗两老师，大家都唏嘘不已。蔡爱梅老师，当年是部队家属，当然是“联指”的成员，但她是一位秉性善良的好人，极赋同情心，她为人呀，是有口皆碑的。

海滨在“处遗”中在广西农学院受了处分。后来，他和黄干事这两个四中“文革恶人”鬼使神差的，又住同一间中学的宿舍，两人也先后中风，先是海滨瘫痪在床，接着是黄干事跟上，也瘫痪了，真是一双难兄难弟也。四中的旧同事一说起海黄两人生不如死的惨状，却是无人报以同情而是说“活该”。¹

（三）强奸、轮奸女红卫兵

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披露：在1967至1968年的大屠杀中，性暴力是一种遍及全省的现象。在整套档案里，完整的强奸、轮奸、性虐待、乃至以性暴力辱尸、毁尸的记载便有225个案例之多。按民间调查，女性受害者的人数应当在千人以上。一时间，杀人奸妻、杀父奸女竟成为广西某些农村地区的社会常态。这些恶性的性暴力案件有如下这些特点：其一，戕害的多重性；其二，预设性和预谋性；其三，残虐性和变态性。²

¹ 新浪“广西文革研究专题”微博：广西文革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应。

² 宋永毅：《广西文革中骇人听闻的性暴力》动向杂志2016年11月号。

8月6日从解放路、展览馆抓获数千俘虏和“流窜犯”后，广西“联指”一大批凶手对俘虏和“流窜犯”执行成批大屠杀，女的遭受强奸和轮奸。对此，韩世福被迫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召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等主要头目，谈对俘虏的政策问题。颜景堂等明白韩世福的心意，坚持继续枪杀俘虏。¹

8月13日，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在北京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主持召开广西“联指”常委电话会议。向颜景堂等头目谈三个问题。一要上缴武器。（因为8月11日“联指”召开所谓“上交武器誓师大会”后，并没有把武器上交）；二要节约闹革命。（因为血洗解放路后，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大吃大喝）；三要执行对俘虏政策。（因为9845人被抓获后，关押期间被一大批“联指”凶手，动用十五种酷刑折磨，成批杀害。不少女红卫兵被强奸、轮奸）。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广西的整个“处遗”工作中，因为当局不想向世人多暴露广西文革惨绝人寰的丑闻和罪行，对施害者的审判和处理基本上是“宽大无边”的。在数万名和杀人有关的罪犯里，只枪决了10人。但就是在这仅有的十名死刑犯里，有三名是因强奸杀人罪被起诉的。他们是：一、李超文，原广西容县六美乡（大队）民兵营长；二、徐善富，贵县大岑公社柳江大队民兵营长；三、王德堂，原广西凌云县武装部政委，现役军人，后任凌云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对李超文和徐善富来讲，共同点是在陷害和批斗所谓的阶级敌人时，强奸被害者的遗属数十人。而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告发，他们都还进一步策划杀人灭口甚至灭门绝户。有时，甚至直接走向女性受害者，以“放水”（交给群众暴力批斗）为威胁，在女性受害者的极度惊恐之际达到肆意奸淫的目的……与上述两案相比，王德堂案则更具有在权力斗争胜利后占有失败者的妻女的色彩……如他的死刑判决书所述，他“利用职权，乘人之危，采取威胁等手段，先后多次强奸被害家属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其中被

¹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30页。

² 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第135、136页。

杀害者之妻四人，被批斗者之妻二人，凌辱女生二人（“四二二”派），病人家属一人，还调戏猥亵妇女五人，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民愤极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死刑犯在犯罪的当时都是国家机器的代表。¹

广西“四二二”派的各级大小负责人均被“联指”抓捕，如熊一军、曹东锋、朱仁、李柏亭、蒋志恭、高兴学、骆伟阳、张英、章子渊、农烈、李维燮等一大批人。这些人之所以未被杀害，是因为想从他们身上搞到更多的“反革命”证据，把他们关押起来，反复审问，逼迫或引诱他们招供是“反共救国团”。这些人之后被多次残酷批斗或折磨，关押多年，其中熊一军被判死刑，只是后来没有执行而已。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政。

（四）焚烧死难者尸体

以下摘录文革密档《南宁市文革大事件》的相关文字：

从68年7月15日到8月5日攻打百货大楼、展览馆、解放路的战斗中，双方武斗人员为了各自的需要，放火焚烧了一部份商店及房屋。此外，广西“联指”及部队和民兵在进攻中所使用的炸药包、手榴弹、炮弹也使一部份房屋、商店起火燃烧或炸毁。在这段时间的战斗中，死亡人数难以查清。战斗结束后，南宁市革委会和警备区给火葬场下达处理尸体的任务。执行任务的共21人，由场领导陆纯云、严石养带队，连续进行27天。他们先处理浮在朝阳溪上的尸体，然后处理解放路的尸体。当时洪水泛滥，工人分乘3条小艇，从朝阳溪上游往下推，推至西平桥推不走了，就把70多具尸体埋在一中后面的旱沟，花了3天时间。

解放路的尸体先用车子运回火葬场火化，但由于尸体腐烂，烧化时间长，经请示市委同意，就地火烧。21个工人收尸，分成7、8个小组，每组1天烧1至2堆，每堆尸体数10具，烧了24个昼夜。烧化地点：布新街口、镇北桥头、工商联门口、醒汉街、石巷口、仁爱路、甘棠街、解放电影院等处。临江的尸体，则推下河里，火烧的都有登记数字。

¹ 新浪“广西文革研究专题”微博：广西文革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应。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

据不完全统计，用翻斗车运去二塘煤坑掩埋约 680 具；在解放路及附近街道将尸体淋上汽油后就地火化的 694 具；在朝阳沟边掩埋的 75 具。从解放路出来的“俘虏”在途中，特别是在市革委大门前左侧的广州照相馆附近被枪杀，其中仅市公安局参加“枪林逼”的被枪杀的 5 人；原中共南宁市委第 3 届候补委员、市历届人大代表、南宁市财办副主任康兴在被抓时，被拉去另一个地方枪杀。原国民党少校起义人员韦质彬（云亭粮店主任）被市粮食局的“联指”头头陆应用等人枪杀。此外，各地民兵在进攻中被打死 60 人；参战的解放军被打死的 26 人；以上死亡人数共 1620 人。但不包括各县领回的“俘虏” 2324 人在途中被杀害的数字。¹

参与中央工作组赴广西“处遗”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有如下记载：

7 月 31 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 月 8 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 5000 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 20 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四二二’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 月 8 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 33 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据 1983 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 33 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 2880 多座（间），建筑面积 46 万平方米，使街道的 5 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 6 千万元以上”。²广西“四二二”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

¹ 《南宁市文革大事件》，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 年 8 月，第 27 页。

²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编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16 页。

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据不完全统计，仅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区、市看守所等10多个单位。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有的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罪名的‘要犯’、‘首犯’处理。被‘俘虏’人员交各县民兵拉回去处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后打死的有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46人。”¹

各县解决后，广西军区便对南宁、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据点实行总攻。枪炮、坦克、水火一齐上。据守南宁展览馆的“四二二”躲进地道，当局采用水攻，下游水库关闸，上游水库放水，一直淹到该城最高点火车站。地道里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无人知晓。

（五）水淹“四二二”

1. 南宁大洪水

与南宁大火相对应的是“七二五讲话”之后八月中旬发生的南宁大洪水。而这导致广西“四二二”灭顶之灾的蹊跷大洪水，在官方的文革密档却语焉不详。随着“处遗”档案曝光，原来这场“南宁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的背后包藏着深不见底的阴谋。

据有关资料记载：1968年7月30日至8月1日，南宁“四二二”的据点和区展览馆、解放路被广西军区指挥的部队攻陷后，南宁市发生了“联指”武装及民兵滥杀无辜的屠城：“南宁七、八月这场大屠杀（不是武斗）死者不下一万人，肖寒（当时是南宁市委书记，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笔者注）则承认死了八千。南宁市公安局的人说，大屠杀过后，南宁市吊销粮簿的有五千人。无数工人、干部、学生、外地逃来的群众（其中只有少数四

¹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类分子)、市民被捉后枪杀,有的全家杀光。”

1968年盛夏,韦国清等指挥军事镇压造反派时,解放路一带的“四二二”据点被攻占后,在区展览馆的地下人防工事里,还藏着许多武装人员和居民群众。面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人员的大军围剿,“四二二”派近三千人(一说七千人)躲进了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和通风防毒气设施,还有供几万人坚守数月的粮食储备的地下人防工程。

1949年中共建政后广西在经济建设上可谓乏善可陈,但在战略公路和人防工程的修建上却大出风头,尤其是南宁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和通风防毒气设施,还有供几万人坚守数月的粮食储备,曾被中央军委表扬为全国典范。因为这一地下工程的先进性,军队和联指一时无法攻入。

为了肃清这些不肯出来的“土匪”,同时为了清洗“四二二”区域到处都是的血迹,和用大水冲走那些虽有汽车搬运,但火葬场烧不完的尸体,广西“联指”丧心病狂地炸开南宁上游百色县之澄碧河水库的闸门,还炸了几个小水库,放大水淹南宁,据说是为了淹死躲在地道里的“匪徒”,其实,还可洗净血迹斑斑的屠戮杀人场。这场大水灾使大半个南宁被淹。

大洪水退却后,军队和“联指”派武斗人员从地下人防工事中抬出一具具发臭的尸体。而这些人未计入这场屠城死亡人数之中,因此具体数字难以确定。但此后地下人防工事喷洒的呛鼻的福尔马林消毒水味,倒是这个城市居民的共同记忆。

“桂林老多”赴京代表杨福廷、唐玉星、李田等回忆:1968年8月26日(正是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日),广西“区革筹”组织他们去南宁解放路,参观“四二二”“放火烧房子”等“罪行”时,他们看见解放路的街道,留有一人多高被水淹过的痕迹,还看到街道上东一具,西一具,约有30多具没被大水冲走的尸体,有的尸体,面部已变成骷髅,但长长的头发还粘连在骷髅上……¹

¹ 广西“处遗”档案:《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李任仁惨遭迫害事件》。

¹ 张雄飞:《酷吏韦国清文革二三事》,张雄飞新浪微博。

2. 韦国清的杀人手段

韦国清搞大屠杀手段十分狡猾，他从不个人跳出来直接指挥，而是用操纵、纵容、默许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如他当了区“革筹”小组长后，1968年3月5日，就用“区革筹”主要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的嘴，说广西有“反共救国团”，6月17日，又操纵“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广西联指”总部立即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造成广西各地3.5万人的“广西四二二”成员和无辜群众因此冤案被屠杀。

又如当他用谎报军情和栽赃的手段，弄得中央也说南宁反抗武装镇压的“四二二”是“土匪”，是“国民党”，要“围剿”，要“实行歼灭”时，他就以执行中央指示的名义，操纵广西军区直接指挥部队，攻打南宁广西区展览馆和解放路，把“四二二”彻底消灭了。

再如1968年7、8月，是广西各地大屠杀的高潮，韦国清所控制的“区革筹”不下令禁止，至到9月，待“联指”把要杀的、能够杀得到的人，几乎都杀光了，才下令制止。

3. 韦国清默许和纵容“联指”开闸放水

1968年8月，正是南方的暴雨季节，邕江流域下起大雨，水位看涨。为消灭这最后一批“四二二”派的“匪徒”，“联指”前线指挥部拟定了用水淹的歼灭方案：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一批反对派。为此，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和军区政委韦国清默许和纵容“联指”开闸放水。

知情人温藩生（南宁地委宣传部处级干部）这样说：“为了炸开澄碧河水库，公安厅派三个人去请示韦国清，韦不直接答复，而是大声说：‘这种鸡巴事还来问我，我哪管得了这样多事！’去的三个人领会韦国清的意思是同意炸，南宁‘联指’指挥部就打电话给百色‘联指’指挥部，说请示了韦国清，‘韦国清说“这种事还来问我”，我们可以自己

干了。’百色‘联指’指挥部就派人去炸了。与此同时，南宁这边通知下游的西津水电站关闸，这样江水就流不下去迅猛暴涨，很快淹了南宁。为了让水进南宁市中心，“联指”又派人去炸市内风景区南湖的坝，水流进了七星路一带。放水的目的，是为了淹死仍躲在地下人防工事里的人和洗清街上的血迹。”¹

8月8日，“联指”前线指挥部命令控制左江水电站的“联指”成员开闸，向南宁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据当时《广西日报》报道，邕江河水上涨到74米，数千间民房受威胁，水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1958年74.71米的水位。从南宁火车站走朝阳路去百货大楼，都要坐船。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处在邕江边上，地理位置比朝阳路还要低，躲避在防空洞中的“四二二”派人员，因为河水暴涨，不少人只好爬出来投降。但又有不少当场被射杀。其余坚守在工事中的数千反对派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活活溺死。

4. 侯德彭西江捞尸体

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以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反共救国团”为名，实际上成批大规模屠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无辜百姓，并灭尸于江河。在广西境内的邕江、柳江、漓江、桂江、郁江、右江、左江、红水河等大小河流漂浮无数遇难者的尸体，顺江而下，经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梧州、肇庆、广州，直达下游入海口的香港，连绵不断，触目惊心，广西文革大屠杀的红色恐怖，令港人震惊！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以致于1984年“处遗”工作中，中共官方都对此慨叹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迫于国际舆论的影响，为了掩盖大屠杀真相，韦国清等人马上明令沿江各县组织打捞尸体，每捞到一具，可以由公家报销人民币10元钱。

许多监督“劳改”的“黑五类”，也被驱赶前往沿江捞尸。

¹ 张雄飞：《酷吏韦国清文革二三事》，张雄飞新浪微博。

方励之在北大物理系的同学侯德彭当时是下放广西大学的右派老师。无独有偶，其广西大学生颜景堂此时正是叱咤风云睥睨天下的广西“联指”总指挥，在“火种”惨案有过指挥杀俘六十一人的“壮举”，并灭尸于邕江河里。侯德彭就被勒令在西江流域捞死尸。是沿江捞尸“黑五类”之列学历最高、名头最响的一位物理学家。

八十年代中期“处遗”，昔日吃香喝辣的“文革新贵”时任柳州工程机械厂党委书记的颜景堂锒铛入狱，侯德彭复出后先后官拜广西大学物理系副主任、广西大学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兼任广西科委主任、宣传部部长、教委主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5. 李任仁之死

李任仁（1887年6月24日—1968年8月18日），字重毅，广西临桂人，为清末秀才，后毕业于广西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教育家。曾为白崇禧在桂林两江小学的老师，桂系元老。中共建政后，曾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西省副省长等职。

1968年5月，南宁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日趋激烈，居住在七星路区党委第二宿舍的区监委、区计委、区经委等单位“联指”派组织的干部，组成了二宿舍的“文攻武卫”领导小组，组长伍愿来（区计委副科级干部、计委“造反兵团”头头）副组长贾峰（区监委科级干部、《红色监察》勤务员）。因李任仁的住宅“畅园”与区党委二宿舍仅一墙之隔，当时住在二宿舍“联指”派的一些干部，无端的怀疑李家有武器和有人在李家秘密开会，恐怕对立派打过来占领李家，危及二宿舍及区党委大院的“安全”，同时还认为李家保存有区党委书记贺希明（与李家有亲戚关系）在国民党时代任职的材料。为了用李家作防卫的据点和寻找所谓贺希明“罪证”材料。几个组织一些头头便研究决定抄李任仁的家，并强迫李搬到区人委第三宿舍去住。

抄家开始之前，区监委“红色监察”、区计委“造反兵团”分别召开了本组织成员会议，动员布置抄李任仁家的行动，具体分配任务，有抄家的、也有巡逻或站岗警戒的。

1968年6月1日早上，由区计委“造反兵团”、“红色监察”、区经委、农村政治部等单位群众组织的干部三十多人，以及驻区党委大院的广西大学、邮电学校的红卫兵和李任仁的秘书共约五十余人，进入李任仁家进行抄家。当时，李任仁夫妇及外孙女、保姆等人在家，李的儿子李海楼、女婿章毅已上班，李的秘书刘功南便打电话通知他们返回，被搜身后才准进家。抄家时，屋外有人站岗、巡逻。贾峰在翻查李家相册时，发现了贺希明身穿国民党军装，佩戴武装带的照片。中午由抄家的人叫来几辆三轮车，强迫李任仁夫妇及李海楼带一个床铺、一把藤椅和随身用的衣物，迁到纬武路区人委第三宿舍居住，李的女儿、女婿一家被赶到区通志馆居住。从当晚起二宿舍“文攻武卫”领导小组派人进驻李家。

这次李家共被抄出的衣物及床上用品等十二箱，文物、金银玉器两大箱和一些古旧书籍，还有章毅的专业中外文书籍、技术资料等一百多本。抄出物品的清点和管理主要由伍愿来负责。衣物箱子集中在一间房子里，金银玉器等贵重物品，由阮肇江、陶子权、（二人系区监委干部）伍愿来、高树田（计委干部）等人清点好锁在李宅楼上壁柜里。箱子、壁柜及房门的钥匙由伍愿来保管。

抄出的东西，除被抄家人员吃用，拿走或烧毁的部分外，各种衣物、文物和书籍等由伍愿来等人于1968年9月、10月间送交南宁市革委会办事组物资清理办公室。金银玉器于7月间，由阮肇江、陶子权从李家壁柜里取出交给区监委保密室存放。1968年9月10日，广西大学红卫兵梁汉隆将抄家时拿走的七只金戒指等，退回交给了贾峰、阮肇江。贾、阮二人以“区党委第二宿舍‘文攻武卫’领导小组”经手人名义给梁写了收条。同年10月31日，阮肇江、贾峰经手把这些金银玉器送交南宁市革委会办事组物资清理办公室。

1968年7月间，“联指”延安片指挥部后勤部长唐智长（区党委办公厅干部）、副指挥梁耀光（市供电所工人）等人找李任仁“动员”他支援民兵打仗，又从李任仁原住处二楼衣架夹缝中抄走定期存款单六千元，金叶子136克。存款提取后作延安片武斗及其它活动经费之用，金叶子向市银行兑换现款后上交市革委物资清理办公室。

李任仁家被抄后，即于1968年6月29日，经区人委办公厅革命领导小组成员黄文楷等人决定，把病弱的李任仁及夫人何若真从家里拉出来，同一些单位的厅局长、民主人士等几十人，冒着烈日徒步游斗。李及其夫人分别挂着“反动桂系头目、老反革命李任仁”、“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大黑牌，并强令李站在高台上示众，八十三岁的李任仁经此凌辱折磨，饮食减退，有时神志不清。

1968年8月中旬，南宁发生特大洪水，李任仁得知市防洪指挥部的洪峰预告，感到住地低洼很危险，须易地避洪。8月15日，其子李海楼到区人委参事室宿舍找廖竞天参事夫妇商量借房之事，廖夫人唐羽君愿意让出一间房给李暂住，但须经参事室秘书、区政协、民主党派革命领导小组成员陆继烈的同意。当唐陪李海楼去找陆提出请求时，陆继烈以“没有房”为由断然拒绝。李海楼又去找区人委办公厅黄文楷求借房，黄也说：“没有房子”而不给解决，易地避洪无着。8月18日凌晨5时许，区党校方向防洪堤决口，李海楼听到报警的枪声，迅即扶李任仁向外逃生。刚走出宿舍十几步，宿舍围墙被洪水冲倒，水势汹涌，无法走出。李又将其父扶回房间，在床上加椅子让其父上坐。因洪水暴涨，两人已无法同时逃出，李任仁催促儿子赶快离开，不要管他。李海楼从窗户爬上屋顶死里逃生，眼见父亲被洪水淹没。在李海楼请求下，19日上午区人委办公厅派人将李任仁的尸体打捞出来，捆在门板上停尸在纬武路口附近马路边，因无人看管，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了。8月20日上午将尸体运进火葬场火化。¹

6. 复员工兵排排长爆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据曾任职广西整党办《广西文革大事记》编辑小组副组长的王定向笔者透露，在1979年广西四届人大会议召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怎样评价周恩来总理在广西文革中应负的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大会期间从某地农村赶来了的一位不速之客给大会提供的一份爆炸性的材料，揭示了1968年南宁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的源头。来人是复员的前解放军某部工兵排排长，他提供的一份材料声称：1968年“七三”布告后一

¹ 广西“处遗”档案：《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李任仁惨遭迫害事件》。

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他奉命率领工兵排在邕江上游炸毁了一座大水库的拦水大坝，当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炸坝。（值得一提是邕江下游还有一座低水头的西津水电站）……大会文件发到代表手中，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大会要求严格保密。与此事有牵连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刘重桂因此下了台。

遍查档案资料，对有关这次蹊跷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在文革档案（无论《南宁文革大事记》或《广西文革大事记》等相关“文件档案”）中均无确切的文字、电报、文件、会议记录记载这次洪水的来龙去脉。

（前述熊一军烧币事件后“有关单位及时地发出了凡有被水浸过、火烧痕迹的钞票均不能流通使用的通告”露出些许端倪）

只有《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页有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的相关描述：

广西“四二二”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派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¹

由此可见韦国清的老谋深算，关于开闸炸堤放水，只是口头指示，不留任何文字记录。

（六）韦国清与黄永胜

1. 韦国清诿罪黄永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与黄永胜关系密切的韦国清，为了撇清与林彪集团的干系，把广西文革大屠杀以及南宁大火之罪责推给了黄永胜，以此向毛表忠心。

同时韦国清在广西对同乡袍泽韦祖珍（原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西区党委第二书记。是韦国清红七军的老同事，同是广西东兰的壮族老乡）背后痛下毒手打成“阴谋夺权，上了贼船的人”。以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获得平反的韦祖珍

¹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页。该书1989年5月成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开本：32开；页数：288页；装订：平装；广西新华书店发行，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该书刚发行不久，就被韦国清的势力以因存在“重大政治问题”即被下令收回销毁故存世很少）

“死不原谅”韦国清，在弥留之际，向老伴留下遗言，追悼会拒绝韦国清参加，韦国清送的花圈拒绝进入灵堂。

官方机密档案记载：（1972年2月）24日、25日，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给中央的报告：《区党委对林彪死党黄永胜插手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揭发材料》。在会上，常委们揭发，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广州军区党委来电报指示：“广西要坚决支持‘四二二’”。当时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党委书记，电报是他指示发的。黄永胜还指示广西军区要就此问题作检讨。韦国清认为，“由于黄永胜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严重对立，挑起武斗，破坏广西文化大革命，使广西受到巨大损失，死人很多，还烧了许多房子，烧了船，对黄永胜的这些罪行，要以区党委名义单独写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并附上电报原件和其他揭发材料。”¹

韦国清这个报告玩了障眼法，只提黄永胜支持“四二二”的表面现象，避而不谈黄与韦联手屠杀“四二二”的事实，歪曲了广西在文革中死人多的真象。韦国清把广西在文革中死人多、烧房子多等巨大损失都推给黄永胜一人。1968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联合发的所谓“破获广西反共救国团”的公告，以及“七三”布告所造成的对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实行大屠杀，又该谁负责呢？

2. 周恩来之变

黄永胜1967年8月28日支持“四二二”电报的背景，是此前周恩来8月24日的奉旨表态支持“四二二”。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在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奉旨代表中央明确表态说“‘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周还严厉批评“联指”搞武斗的错误。周一句圣旨简直就是陷入绝境的广西造反派的再生父母！广西造反派绝处逢生，再得二春。但仅仅一年后的1968年“七二五”中央首长召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对广西“‘四

¹ 摘自广西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10、11号。

二二”翻脸如翻书，一句“‘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就等同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

3. 军人集团在广西布下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

文革之初，韦国清就是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后任广州军区政委），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1968年3月升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关系十分密切，韦、黄至始至终支持两广当地的保守派，韦国清是支持保守派“联指”打压造反派广西“‘四二二’”的；黄永胜是支持保守派“东风”派打压造反派“旗派”的。



图9：支持“四二二”的6984部队进驻广西医学院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四二二’”的军队调走；3月的广州军区衡山会议，黄永胜内定“‘四二二’”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四二二’”。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

诱使造反派抢“援越物资”，扩大武斗规模，再人为制造阻断广西援越铁路运输大动

脉，是军人集团势力在文革崛起战略中关键的步骤。军人集团在柳州火车站设局，诱导柳铁造反派抢劫军列的事件栽赃造反派抢“援越物资”（本来那批子弹不是援越物资，只是解放军的正常战备物资——是沈阳军区运往来宾县凤凰军火库的弹药。被造反派抢了，就上纲上线说是“援越物资”了），军人集团还将计就计设局“5.25”假收缴子弹的解放军之手拱手送与之匹配的七百多支五六式冲锋枪，然后请君入瓮。将“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强加在广西“‘四二二’”身上，军方由此取得向毛施压，倒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从而以执行中央《“七三”布告》指示的名义，把他们置于死地！

柳州造反派“5.21”胆敢抢“援越物资”！接着“5.25”又吃了熊心豹子胆抢解放军七百多支冲锋枪！这两起轰动全国的“反革命事件”导致全国造反派的“政治地震”，其波及范围和深度都让人瞠目结舌——是军方倒逼毛中央宣判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七.三布告》颁布的直接诱因。对文革造反运动的命运走向影响深远，是文革造反派由盛而衰的命运转折——1968年夏，毛中央抛弃造反派的一系列文告及行动皆肇始于此。

4. 《七三布告》乃周恩来黄永胜一手炮制

文革研究学者谭迦洛（笔名阿陀）指出，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和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乃周恩来黄永胜一手炮制！

《周恩来年谱》279页一一

谈到“七三”、“七二四”布告时，周恩来说：两个布告，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插话：这也是一大发明。要发布告，造舆论。黄永胜和总理去议了一番，议出了这张布告。¹

广西是林、周配合实现(毛、林、周三方共识)结束文革的试点。

韦国清是全国文革中唯一没被打倒的第一把手，而指名韦复军职出任的正是周恩来。

《七三布告》是韦国清一九六八年春开始频频以广西区革筹名义上报材料的“成果”。

¹ 阿陀：《发现“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出处》（文革五十周年随思录 37）

三月“杨余傅”倒台，黄永胜进京接任总参谋长，配合指挥，上通林周，下达两广。

从六八年四月开始，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逐省研究解决方案，《七三布告》前第一批讨论名单先后为陕西、江西、徐州、广西、湖北、安徽、云南、广东、福建及甘肃，一般都是一会一议(偶有两会)，唯广西问题(6/8—7/3)六会六议。

《七三布告》就是中央对广西经验正式肯定及推广。¹

通过上述排列组合，抽丝剥茧，可以看出一条清晰脉络，发现所有线索的矛头都指向军人集团及军头黄永胜、韦国清，找到可供破案的“人骨拼图”，基本拼凑还原出军人集团通过军头黄永胜、韦国清，伙同周恩来的官僚集团倒逼毛的中央文革合谋屠杀广西造反派的尸检报告！

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之所以力挺韦国清，就是要凭借“抗美援朝”的格局，在广西布下一个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此增添军方政治博弈的筹码，以达到增加军队影响力和文革话语权的目。军方高层是把柳州造反派当棋子，在下一盘更大的棋。换言之，“七三”布告的出笼，不是毛授意韦在柳州设局，而是军人集团两广军头韦国清与黄永胜联手为倒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而在柳州火车站设下了“援越物资”这个“陷阱”，也就是丛林战高手韦国清用了个小计谋，巧施连环套，柳州造反派中招，全国造反派遭殃，终于使“造反派”陷入不义之泥淖。（未完待续）

2016年11月8日

初稿于丹麦

2016年12月9日

修改于波罗的海“听涛轩”

¹ 阿陀：《初探毛林分道扬镳轨迹》（文革五十周年随思录 36）

【评论】

从地方文革看文化大革命

——读《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¹

钱理群

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空前的广泛参与性，不仅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卷入，而且革命的风暴横扫中国每一片土地。因此，我们对文革的考察与研究，就不能只集中在上层，更不能局限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心地区，而不可忽视遍布神州大地的地方、基层文革运动。这恰恰是文革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可喜的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当事人写下了自己的文革记忆与反思，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所在地区的文革领袖和骨干，他们的回忆不但提供了已经逐渐被淡化、遗忘的非亲历者所不知的内幕与细节，而且其所作的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能给后来者以众多的启示。眼前的这本《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在类似的专著中论述最为全面、详尽，正可以作为文革时期，甚至是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地方政治的一个珍贵样本”²来加以研究。

如研究者所说，山西文革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一月革命”夺权中，山西省“一·一二”夺权是“全国第一夺”，“最早得到中央承认和宣传的山西夺权，就自然成了夺权的‘样板’”。³本书作者告诉我们，夺权后建立的新权力机构命名为“革命委员会”就是山西太原夺权时首创的；而《人民日报》发表的《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在总结山西夺权经验时，就强调了“山西的革命造反派”的作用和“山西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支持与援助”，⁴以后又进一步完善为“革命干部，军队与造反派群众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一书是山西文革的亲历者集体编写的一本近百万字的地方文革史著作，由石名岗执笔，分上下册，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出版。

² 丁东：《〈文革中的山西〉序》，《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1页。

³ 何蜀：《民间编写文革史的可喜成果（序二）》，《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6页。

⁴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145页，第141页。

的三结合”，作为文革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革命干部、军队、造反派群众也构成了山西以及全国地方文革的三大原动力，地方文革就是这三种力量在自己的本乡本土演出的惨烈话剧。我们也据此作三个方面的叙述、分析和讨论。

一、文革中干部主导的地方政治

在讨论干部在山西文革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之前，需要对山西干部的特点略作分析，主要有二。首先是“山头林立，派别甚多”。作者介绍说，“山西省干部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太行的干部，太岳的党，晋绥干部后娘养，晋察冀干部歇凉凉’”。说的就是山西干部由历史形成的四大派系与他们在山西现实政治结构里所处的不同地位。他们都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山西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其中贺龙率领120师在晋西北创建了晋绥根据地；聂荣臻率领115师在晋东北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率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在晋东南创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以后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及新建的385旅多在太行山一带活动，是为太行区；陈赓领导的386旅、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多在太岳山一带活动，是为太岳区。建国前后，晋察冀和晋绥主要高级干部纷纷调离，山西省遂由太行和太岳的干部主政，文革开始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王谦、省委常务书记王大任就分属太岳派与太行派。

山西还有一批外省籍的外来干部。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袁振就是山东人，是冀鲁豫区的干部。此外还有因犯错误贬到山西的干部，其中就有原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刘格平，原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也任山西省副省长和省委常委的刘贯一，以及原包钢党委书记、时任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原籍河北的陈守中及其夫人刘志兰（原左权夫人，时任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等等。

由以上山西干部的历史渊源的考察，可以看出，作为老革命根据地的山西干部与从山西出去的中央干部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不仅山西干部以与自己有历史关系的老领导为靠

山，这些中央干部也是把山西视为自己的地盘。山西籍的彭真、薄一波都是山西干部的领袖级人物。由于晋冀鲁豫根据地是以山西为中心的，山西也成了邓小平的基地。刘少奇的干将安子文是陕西人，但他长期在太岳区工作，也算得上多半个山西干部，他担任中组部部长对山西籍的干部也时有照顾，卫恒就是他培养的典型。而以上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在文革中都属于主要打击目标。这样也就使得山西干部与文革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极其复杂的关系之中。¹

这些有着不同背景与复杂关系的干部，在文革中轮番主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干部的相互博弈，构成了山西文革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也可以按照他们的上台与下台，将山西文革分为五个时期。

（一）卫恒、王谦、王大任领导时期（1966年5月16日——1967年1月12日）

一切听命于中央，这是文革前中国地方政治的最大特点；紧跟中央，就是基本的为官之道。因此，文革从党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开始，山西党政领导也和全国其他各地的省委、省政府一样，按照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发布的中央指示领导本地文化大革命，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中央最高领导中存在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司令部。一切都按部（中央部署与历来政治运动的惯例）就班：首先主动抛出党内右派，实际上是党内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干部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把他们定为“山西三家村”，将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言行，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在群众起来贴出《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的大字报，对省委提出怀疑时，就派出工作组，并在大中学校机关干部、教师、学生中“划分左中右”，被划为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达三分之一之多，显然是要把文革引向一场新的反右运动。²

但干部中的敏感者已经察觉“此一时非彼一时”，文革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重心在

¹ 以上关于山西干部特点的讨论，均见《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55页，第106页，第604—605页，第103页。

²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58页，第73页，第74页、

党内。于是，就有了在5月20日召开的华北局会议上，“非李雪峰派”（李雪峰时为华北局第一书记，太行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是王谦等山西太行派的老领导）的时为太原市委书记的袁振的“炮轰山西省委”，同时遭到山西省委与华北局的猛烈反击，称其为“野心家”、“伸手派”。袁振在高压下一面赶紧检讨，还把陈守中等市委领导拉进他的“五人反党集团”；一面在暗地里“指导”不明内幕的中学生、大学生贴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提出“炮轰卫恒，支持袁振”的口号。¹这是文革中山西干部的第一次公开分裂，而且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派系斗争的色彩。这也是第一次干部对群众造反的参与和操纵，开了一个后果严重的先例。

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了党的最高层所谓“两个司令部”的矛盾与分歧，特别是从1966年10月开始发动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紧跟刘少奇的党中央的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就处于极度被动的状态，省委再度发生分裂。先是时为省委常务书记的王大任直接支持他们选中的某一造反派组织召开全市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径直点卫恒的名。以后卫恒在与另一批造反派“辩论”17小时以后，签字接受了造反派的某些要求。王谦、王大任等八名省委常委就联名给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雪峰等中央领导写报告，指控卫恒向造反派妥协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要求撤换其第一书记职务。八名上告者中有六人（包括发起人王谦、王大任）属于太行派的干部，这样的公开上告属于太岳派的卫恒，就明显地把山西的文革纳入了派系斗争的轨道，对以后的山西文革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²

但无论如何，王谦和卫恒之斗，还是山西派干部的内斗；而在当时的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看来，他们都属于刘少奇的干部，是不可信任的。于是，就注意到了文革前贬到山西的外来干部。尤其是刘格平，当年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按照经中央批准的刘少奇的指示发表声明出狱，他是唯一的没有签字，留在狱中的干部。在文革反对“刘少奇叛徒集团”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54——55页，第57页，第75页。

²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99页，第98页。

的热潮里，他就自然成了抵制刘少奇的“英雄”，拥有很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正是看中这一点，发出指示：“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决心以山西为夺权的突破口，除有刘格平这样的干部外，还因为有支持造反派的山西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以及毛泽东所欣赏的陈永贵等劳动模范，以后刘、张、陈这三位在山西文革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一月革命中最紧要的是让刘格平“站出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都先后接见刘格平传达毛泽东指示精神。

1月6日刘格平受命回晋，立刻联络上了同为外来干部的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串联时的统一口径是：“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都不足靠，只有外来干部联合起来造反。1月10日就贴出了刘格平领衔的五人大字报，点明“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的问题了”，实际发出了夺权的信号。经过一段在造反派组织中的紧张工作，得到了响应（王力、关锋还专门在北京接见山西造反派代表，要求他们支持刘格平），很快就在1月12日晚，宣布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了省委和省人委的权。1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山西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并发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代表中央表态承认与支持山西“一·一二夺权”。¹

整个夺权过程表明，这完全是一场毛泽东下决心，周恩来、中央文革具体策划、指挥的，自上而下的奉旨造反、夺权，而绝非自下而上的群众夺权。而且同样是利用一派（外来干部）打击一派（本地干部）的派系权力之争，而绝非宣传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刘格平统治时期（1967年1月12日——1969年7月）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103页，第104页，第106页，第107页，第109页，第111页，第122——124页，第141页。

刘格平掌权以后，立刻挥舞“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对夺权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进行无情打击和报复，即所谓“左右挥舞”，“左一刀”砍向温和造反派的工人兵团、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右一刀”砍向保守派组织工联、红卫兵团，将其负责人逮捕入狱。¹

在3月12日，在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央批准，刘格平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可以说牢牢掌握山西大权以后，他又迫不及待地对刚成立的革委会内部的不同派别大打出手。于是，就有了4月14日由群众组织出面、刘格平幕后策划、袁振支持的“炮轰刘志兰”事件。

刘志兰是新被选为省革委副主任的陈守中的夫人，她自己也是省委核心小组的成员和办公室主任。因此，炮轰刘志兰，矛头是指向革委会领导核心中的陈守中，还有刘贯一等人的。选择刘志兰作突破口，是因为刘志兰参与了华北局“炮轰李雪峰”的行动，引起了支持李雪峰的中央文革的康生等的不满，更因为刘志兰和她的前夫左权与彭德怀夫妇关系密切，他们的孩子一直由没有子女的彭德怀夫妇抚养，在彭德怀倒台以后，也依然有来往，这都为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派所不容。而刘贯一也因为在华东局与饶漱石关系不错而得罪过康生。刘格平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就要通过打击与自己政见不合的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来进一步投靠中央文革派。

所谓“政见不合”主要是指在省革委会成立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下一步发展方向上，刘格平（以及支持他的袁振）与陈守中、刘贯一（以及支持他们的张日清）之间发生的分歧。刘格平、袁振都是“继续革命”派，主张追查卫、王、王的旧省委的“黑二、三线”，扩大打击范围；而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都反对继续追查，在他们看来，夺权以后，革委会的工作重心应该转入恢复革命与生产秩序，刘贯一甚至提出，山西文革“已进入斗批改阶段，拟在三个月内完成，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他们也就站到了中央文革派的对立面。刘格平等敢于“炮轰”，有恃无恐地公开分裂革委会，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149——150页。

1

在“炮轰”事件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刘格平的夫人丁磊。文革前她只是省人委信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因为参与谋划夺权，革委会成立以后，就担任了省人事局局长。了解内情的当事人回忆说，“此人看起来比刘格平小许多，个子不高，是个权欲熏天、不甘寂寞、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主。一直受压制的刘格平在山西掌了权，是她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呼风唤雨，跃跃欲试，她的家成为山西实际的权力中心，后来山西一系列事件，都有她浓浓的影子”。²这样的夫人参政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革政治现象，我们在下文会有专门讨论。

而且矛头很快就直接指向了掌握了军权的张日清：刘格平清楚，这才是他的真正对手。但要真正打倒张日清并不容易。这里有一个细节：北师大附中学生卢叔宁文革中到山西漳河边的李家沟插队，当地农民谈到山西的两派斗争，都认为根子就在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刘格平和省军区司令张日清的矛盾。这就难办了，因为他们的“后台都太硬”：刘格平是毛主席支持夺权的干部典型，张日清是林彪军队支左的典型。有的老乡甚至由此而提出疑问：“莫非毛、林也是两派？”³老百姓的这一观察是抓住了要害，道破了山西文革、全国文革的关键。

但到了7月，却出现了转机。毛泽东发出指示：“69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和69军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以谢振华为代军长的69军原驻扎在河北保定，1967年2月被调防山西，在山西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两派斗争中一直持中立态度，现在毛泽东指示他们支持刘格平，实际也是对刘、张之争中对刘格平的支持。再加上紧接着发生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在毛泽东的默许、林彪的支持下，中央文革掀起一股“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反军浪潮，张日清就自然被视为“山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185页，第188页，第182页，第179页，第229——230页，第179页。

²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182页，第196页。

³ 卢叔宁：《劫灰残篇》，第54页，第5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出版。

西的陈再道”，以致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关锋公开表态，支持“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的口号。最后在1967年8月6日通过、毛泽东批准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里，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刘格平、袁振、陈永贵等“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大方向是正确的”，张日清“犯了方向性错误”。¹刘格平终于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下，取得全面胜利。

刘格平也因此利令智昏，在接下来的近两年的统治里，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主要有三：

首先是先后发动“八月大扫荡”和“九五血染”，对支持张日清、反对刘格平的县武装部和温和派、造反派组织进行残酷打击和报复，从此大失民心与人心。

其二，在军队问题上制定了一条“依靠025、027、8731，团结4642，斗争山西军区”的错误路线。所谓“025, 027”是山西两所航校的代号，8731是驻扎在山西的总后的后勤部队，本身就没有多少实力和影响，依靠他们的支持，显然起不了作用；4642是69军代号，刘格平居然将毛泽东“69军地位很重要”的警示置之脑后，把他们作为“团结”对象，就等于将其推向对立面；而明确以山西军区作为“斗争”目标，更是不智的树敌行为。夫人丁磊还在9月11日将此路线公之于众，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我孤立之路。而全国形势的变化大概也出乎他们意料：毛泽东突然把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抛出，高呼“还我长城”，试图在军队与文革派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这就将地方上刘格平这样的紧跟中央文革与军方作对的干部置于极尴尬的不利地位。到又一次解决山西问题的“12月会议”上刘格平就受到了严厉批评。会议专门决议成立新的山西省军队支左领导小组，指定谢振华为组长，张日清任第二副组长。自此以后，谢振华领导的省支左领导小组和刘格平领导的省革委往往意见相左，尤其是军队进入地方和大企业进行军管以后，从上到下都形成两个对立政权，并引发了持续一年半的“局部国内战争”。这期间，还发生了袁振与刘格平的分裂，即所谓“红色政权的第二次分裂”，刘格平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其三，刘格平在12月会议上受到批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格平、丁磊夫妇支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274页，第289页，第302页。

持编写《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书，大搞个人崇拜。书中多次称刘格平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丁磊为“红岩上的红梅”，吹嘘刘格平“对我们的伟大祖国，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闪射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这就不仅犯了文革之大忌，更暴露了刘格平要在山西大搞“独立王国”的野心，这就自然为毛泽东的中央文革所不容。于是，就有了最后的结局：1969年7月，在山西局势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情况下，除颁布《七·二三》布告（我们在下文会有详尽讨论）外，又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由谢振华接替刘格平，担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同时中央军委也任命谢振华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由谢振华主持山西党政军全面工作，彻底结束了山西文革史上的“刘格平时代”。¹

（三）谢振华主持山西全面工作时期（1969年7月——1974年4月）

有人说谢振华是“临危受命”，主要是受周恩来之命；后来邓小平在评价谢振华的工作时也说：“他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所谓周总理的指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恢复秩序。谢振华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调动二十多个团的兵力，进入全省各地、各大单位，进行军管，按《七二三布告》精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制止了武斗。接着，又采取两个措施，一是清理造反派队伍，特别是对紧跟刘格平、与军队作对、参与武斗的激进造反派领袖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其中将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总指挥、决死纵队总指挥、山西省革委常委杨承孝的处决，更是引起了全省上下的震动。对没有参与武斗的和军队合作的温和造反派头头则安排插队劳动，或担任社、县级基层领导工作。到1970年7月通过中办学习班的方式，让所有的造反派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还下放了一万五千到两万名机关干部和大中专院校的干部和教师。在清理造反派的同时，又大力解放干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复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322——336页，第337——377页，第380——381页，第407页，第379——380页，第392页，第387——388页，第481页。

职，有的还得到提拔。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就使得在全国最早夺权的山西，成为“否定一月革命风暴成果最早的省份之一”。所谓“恢复秩序”，就是全面恢复文革前的统治秩序，对在文革中试图打破秩序的激进造反派进行了严厉惩罚和报复，却又没有触动支持和操纵他们造反的干部。另一方面，谢振华又以极大精力坚持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经过真抓实干，山西省1970年粮食产量第一次在历史上突破百亿斤大关，工业产值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大型企业都恢复了正常生产¹：应该说，谢振华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的期待。

但谢振华主政不久，就和省革委领导班子的另一种力量发生了分歧。这就谈到了山西文革特有的通天人物陈永贵。文革一开始，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就宣布“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的“英明决策”，这就把大寨和陈永贵推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地位。对本来就存在许多水分，引起众多怀疑，以致“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大寨经验”的态度，就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甚至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陈永贵本人也由此登上山西和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逐渐实现了“从劳模到政客”的转变。山西省革委会一成立，陈永贵即被推为革委会副主任，在以后的省革委会内部的斗争、分裂中，陈永贵始终坚定地站在刘格平这一边，并且有深度的介入，主要是在大寨所在的昔阳地区大搞“独立王国”。把所有对大寨经验有所保留、即使曾经支持帮助过大寨的地、市、县三级干部，通通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残酷批斗，并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重新总结和解释“大寨经验”，提出“农业学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农业学大寨，狠斗走资派”，“大寨的历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等极左口号。同时又按照毛泽东“一大二公”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把昔阳搞成“穷过渡”试验田，全县搞了大队一级核算，还计划建成全民所有制的县，又破坏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评“政治工分”，同时在农民中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迫劳动，大搞劳民伤财的“改天换地”的工程。这样的“文革化”的“大寨经验”自然引起了普遍反感，在谢振华看来，这是对“自力更生，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481页，第544页，第483页，第487—492页，第510—515页，第516页，第522页，第521页。

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的背离与扭曲，是一种“过‘左’的错误做法”。因此，在1968年8月召开的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上，当陈永贵把大寨经验归结为“发扬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谢振华就有意识地强调了“先公后私”的精神。

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和他的后台，尽管周恩来曾专门就此表态支持谢振华，但“反大寨”从此成为谢振华永远摆脱不掉的罪名。在谢振华全面主持山西工作以后，陈永贵也就成为他在革委会内部的主要反对派。¹此后的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陈永贵在十一届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权力已经居谢振华之上。

到了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时，包括谢振华在内的按周恩来指示办事的省委书记就成为中央文革派的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江青首先抓住了1974年1月山西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剧目《三上桃峰》，在故事发生地点和女主人公设置上大做文章，认为“桃峰”是影射“桃园”，“女”主人公即暗示王光美，据此而安上“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并指明这是谢振华幕后指使，江青还特意穿上军装看戏，表示自己也是军人，“就是要炮轰谢振华”。

在中央文革发难以后，陈永贵终于等到了与谢振华较量的机会。本来此时的陈永贵因自己的历史问题（抗战时期参加日伪情报组织，担任负责人）被揭发而处于被动地位。尽管谢振华按照周恩来“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处理”的指示，保护了陈永贵，但陈永贵依然怀恨在心，并乘中央文革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批谢曹（谢振华的副手曹中南）”运动之机，充当急先锋，在1974年3月18日中央主持的山西省委常委汇报会上首先开炮，猛击谢振华。在会上江青当众宣布让陈永贵主持对谢振华的批判。从此谢振华就实质上被罢了官，由陈永贵主持山西工作，由王谦协助（王谦在1970年即被“解放”，1973年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书记）。在1974年3月召开的有两派头头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上，猛批谢振华，追问“是否上了林彪的贼船？为什么批极左？为什么整陈永贵的黑材料？”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535页，第537页，第542——543页。第544——545页，第546页。

在谢振华写信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以后，毛泽东批了四个字：“到此为止”，谢振华的时代也结束了。¹

（四）山西文革的王谦、陈永贵时代（1974年4月——1980年10月）

从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中作为省委第二把手被打倒，到1974年4月重新上台，而且成为了第一把手，王谦命运的大落大起，似乎象征着山西文化大革命“颠倒与再颠倒”的历史过程。从山西政坛自身的政治结构来看，从“晋人治晋”的卫（恒）王（谦）王（大任）时代，中经“外人治晋”的刘格平时代和谢振华时代，现在又回到“晋人治晋”的王（谦）、陈（永贵）时代，也是一个历史的轮回。其中也有变化，即从太岳派（卫恒）主政到太行派（王谦）主政。不管怎样，王谦终于实现了自己独掌山西大权的梦想。但他还需要在全国政治结构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在中央寻求新后台。

总体而言，文革前的山西，包括卫王王时代，由于历史的原因，都属于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体系，即刘少奇体系，这是他们在文革一开始即被打倒的主要原因。现在，自然必须改换门庭。因此王谦再度上台，当务之急就是如何获得中央文革派的信任与支持，陈永贵自然是最好的牵线人。尽管在自己落难昔阳时，曾遭到陈永贵派的红卫兵的残酷批斗，被打得口吐绿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但王谦也只能忍气吞声而与陈永贵结成联盟，不是为共同的政治信念、理想，仅仅是因为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同时，王谦还不遗余力地和支持刘格平、陈永贵，打倒自己的激进造反派组织建立联系，将昔日的对手变成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以便苦心经营一个上有后台，下有死党，一切听命自己的独立王国。

但他却忽略了民心、人心的变化。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七斗八斗，一切都回到文革前；但有一个东西是回不去的，即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中国人的思想变了，而且是全社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564页，第575页，第578——579页，第580页，第586页，第586页，第590页。

会的，无论是普通民众（工人，农民，市民，教师，学生等等），还是各级干部，党员，特别是青年人，对中国的社会、国家、政党——都有了自已的看法，尽管自有深浅，认识也不同，但至少不会随意听命于某个领导，某种权威说法，而要自己“想一想”了。而且文革中形成的政治派别，只要人还在，心不死，就会以各种形式显示自己的存在。这恰恰是只迷信权力的政治家所忽视也不懂的。

于是，就出现了1974年11月山西省补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王谦落选事件，这不但引发了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震怒，批示说：“这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共产党不选共产党的严重事件”，王谦自己也懵了。这样的革委会成员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他永远不能、也不想理解的；他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反对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这次落选事件中起了作用的温和造反派和干部，进行镇压与报复。同时变本加厉地投靠中央文革派。¹

他也终于有了机会：1976年4月，北京发生了“四五”运动，山西也有群众到太原五一广场送花圈，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派随即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谦闻风而起，召开誓师大会，带领七万干部党员，举行声势浩大的火把游行，他自己走在队伍最前面，高喊“打倒地富反坏右总代表邓小平”，“与邓小平血战到底”的口号。接着他又发动大规模的清查运动，逮捕55人，拘留118人，隔离审查14人，受到牵连和追查的竟达4万余人。同时继续批判“谢曹路线”。王谦如此不顾民心民意的倒行逆施，引发了更大的反抗：在市革委大院和省委门前，先后出现了“三人大字报”和“三十二人大字报”，批评王谦打击一大片，在干部中引起广泛共鸣。民怨逐渐积累，到1976年8月23日，就发生了一部分造反派工人“游斗王谦”的事件。据说这是“中国文革最后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被批斗的事件”。²

王谦则回之以更疯狂的报复。而且是发生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以后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618——620页。

²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701——702页，第704页，第708——709页，第710——711页。

的“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王谦因为继续掌控着省委的大权，也就掌握着清查运动的领导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轻而易举地将清查“四人帮”变成掌权派清查在野派，对自己的干部与群众进行残酷打击与报复，因此被称为“倒清查”运动。王谦首先按自己的利益需要，另立清查标准与对象，一查“反大寨分子”，这自然是对陈永贵的利益回报；二查“四五”运动积极分子和张赵集团（这是一个觉醒的造反派民间组织，我们在下文会有详尽讨论），这是将反“四人帮”的力量当作“四人帮”来打击的一个典型；三查“谢曹分子”，这是借机打击自己的反对派和不同意见者。

每一个打击目标，都制造了无数的冤案：在昔阳，有141人因“反大寨”被打死、逼死；被打成张赵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有300多人，被牵连的达两千多人；因支持谢曹观点而受到清查的省级机关干部，厅、局一级干部就达80多人；太原市、晋东南地区、太原铁路局被清查对象都达一万人。据官方公布的报告，全省清查一万五千人，涉及三万五千人。¹论者说，这样的全省大逮捕、大隔离、大揭批，“其规模之大，乃建国以来所罕见，实在是不亚于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山西文革的“结尾”与“开头”竟是“一样残酷而惨烈，一样的无法无天。”在镇压反对者、异己者的同时，王谦和陈永贵都自觉培养亲信，扩展势力范围。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仍兼任山西省委书记，且竭力安排大寨人、昔阳人到省、地、市、县担任领导职务。王谦更是以在文革中是否支持自己和陈永贵、刘格平为选干标准。有人谈到“王谦身边麇集着一批趋炎附势之辈、告密者之徒。这些人对王谦惟命是从，王谦对这些人垂青器重”，“这些人已掌握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领导权，尽管他们几乎成了那个地区或部门的‘土皇帝’，乖谬悖理，胡作非为，什么非法、缺德的事也敢干，但是由于和王谦有不可告人的关系，王谦一个也不予以处理。”这是文革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不仅仅是“宗派主义”的问题。最后由于陈永贵和王谦在邓小平与华国锋的权力博弈中站到了华国锋这一边，陈永贵在1980年8月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

¹ 见朱玉华：《关于山西全省清查总结报告》。

的职务，王谦也在同年10月被免职，调离山西。¹

（五）霍士廉、李立功主政期间对山西文革的最终处理（1980年10月——1984年）

王谦继任者霍士廉来山西前，邓小平特地接见他，关照说：“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你到山西任第一书记、罗贵波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到职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霍士廉主政山西，主要任务就是为谢振华、曹中南彻底平反，为清查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解放支持谢、曹的干部。对山西文革问题的处理也就到此为止。霍士廉虽是山西人，但和山西主流派太行、太岳系干部并不熟悉，他不想介入山西干部的派系斗争，也不准备处理山西某些干部（无论是刘格平派，还是王谦、陈永贵派）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以致罪行。这样，他虽然为冤假错案平了反，却对冤假错案的制造者采取了“放虎归山”的放任态度，这就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²

继任的李立功（他本人也是山西人，在山西有一定干部人脉关系）上台以后，立即与王谦派系的干部，也即前文所讨论的文革既得利益集团聚合在一起，继续对文革中反对王谦、陈永贵的干部与群众进行疯狂报复。这回他们把握的时机是1982年、1983年和1984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所谓“三种人”，是文革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陈云给文革中的造反派横加的罪名，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所谓“追随——”罪首先是违反基本事实的：造反派的造反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文革初期也根本不存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帮派思想严重”更是一个主观随意性极强的罪名，而更具实质性的干部中的“帮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719页，第727——728页，第739页，第741页，第764页，第790——791页，第723页，第725页，第793页，第823页。

²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793页，第795页，第799页。

派”却不在追究之列；证据确凿的“打砸抢分子”当然应该依法追究，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将干部子女，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女中货真价实的打砸抢分子轻轻放过。可以说，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动的这场“清理三种人”运动本身就是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即所谓“走资派”）对造反群众的“反攻倒算”。到了山西这样的地方上，就真的成了“还乡团”。所报复打击的不仅是造反派中的激进派，造反派中的温和派也一网打尽。¹据主管清查“三种人”运动的省委副书记透露，山西全省清查对象有2170多人；最后定为“三种人”的286人，其中的党员一律开除党籍；定为“严重错误”的737人，其中处以上干部272人，一律清出领导班子；定为“一般错误”的819人。²这就是包括山西文革在内的中国文革的最后结局：文革中起来造反的群众一律受到严惩，文革中支持、操纵造反的干部大都得到保护，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基本官复原职，许多人都得到重用，继续垄断着党和国家权力：奉行的还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中国老传统。

于是，就有了本书作者，即历史的当事人，主要是温和派造反派领袖与骨干，对山西文革的总结：“十年文革，最起码有八年是‘革命干部’（当然包括军队干部）指挥着‘造反派’斗来斗去。可以说，这八年间主要是党内干部之间的斗争。这些干部观点和立场则是来自中央各派之间的斗争。”³

我在考察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时，就发现这些运动“无论有着怎样宏大目标，落实到基层，就往往和各单位内部的各种矛盾，复杂的人事关系纠缠在一起，成了意见之争，利益之争，甚至派别之争，从而不同程度上模糊了运动的政治性，削弱了运动的政治效应，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内在矛盾”。⁴我们在作了山西文革历史的初步考察以后，也同样发现，无论毛泽东在他的文革设计里，如何强调要以群众政治与独裁政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810页，第803——804页，第803页，第811——818页。

² 见卢其勋：《回顾与反思》。

³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807页。引文中所说“十年文革”，是沿用文革研究者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即把文革时间规定在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到1976年“四人帮”被捕这一段历史。按照本书的记载，山西造反派在1970年就通过中办学习班退出历史舞台，那就只有四年时间。但造反派退出后仍有活动与影响，1974年王谦落选事件中就有明显的造反派活动的身影，或许就因此而把造反派参与文革斗争的最后时间定在1974年，就正好是八年。

⁴ 钱理群：《1952——1969：读王瑶“检讨书”》，《岁月沧桑》，第183页，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出版。

治的直接结合以取代官僚政治，高喊“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到了地方文革的实践，起决定作用、不可撼动的还是地方官僚政治，依然由干部指挥、操纵一切；无论毛泽东为文革制定了怎样宏伟的政治目标，举国上下高喊着怎样慷慨激昂的革命口号，落实到地方，就变成不同派系的干部之间的利益之争，群众不过是干部派系斗争的利用工具和牺牲品。

应该注意的是，文革中的干部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在文革前实际已经发生。前文说到，在文革中作为新干部的陈永贵，有一个“由劳动模范到政客”的发展过程；应该说，这样的发展演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普遍性的。就山西文革政坛上最为活跃，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刘格平、王谦而言，他们原本也都是具有理想、追求的革命者。刘格平当年拒绝按照党的上级安排在悔过书上签字，至少说明他是具有革命气节的；王谦在建国初期，倡导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尽管可以认为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但不可否认他是有自己的理想追求的，说他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的。¹但是建国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它的干部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革命理想变得越来越遥远、抽象，最切近、也为最实际的是执政地位拥有的权力带来的利益。到了文革时期，对权力的追求与垄断，就越来越自觉。因为文革过程中他们自身和家庭命运的起起落落，都证明：“有权就有一切，失去权力就没有一切”，这几乎成了所有文革参与者的一个共识：无论是干部，还是造反派都是如此。文革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最大、最深远的影响，就是它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自觉地维护与争取自身的利益，而关键就是权利的争取和权力的争夺。“夺权”成为文革的核心概念和中心任务，绝非偶然。像刘格平、王谦这样的干部就更有条件，也更加自觉地参与这样的权力争夺战。他们在夺权中的无所不用其极，在掌权后不择手段地维护与强化个人的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也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的一种危险倾向，即越来越以巩固党自身和个人的执政地位与权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597——598页，第595页。

力为目标，革命理想云云，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宣传，是维护执政合法性的手段，他们自身是否真的相信、是否准备实行都成了问题。他们中有些人在文革后，也吸取教训积极推动改革，但也是以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与权力为前提和最终目的的。真正坚持最初的理想，不计较党的执政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党的干部和党员，不是没有，却是越来越少，而且在党内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这就意味着，执政党正在由一个有理想与信念的党，逐渐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这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文革是一个关键环节：我们从山西文革历史中就可以看出，一个以干部为核心的文革既得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如何主宰中国地方政治，形成了怎样的中国的和地方（山西）特色。

就我们现有的考察、总结和研究，初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它是以争夺、维护、不断扩大权力为中心的，并自觉运用权力，力争个人、家族、派别利益的最大化。

其二，它自身具有极强的宗派性，是以同乡、家族、老上级，老部下，老战友、老同学——关系为凝聚力，抱团拉帮结派，同时有有极大排他性。这是最能显示中国宗法社会的传统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的。这也是山西特色，另有阎锡山治晋的现代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文革开创的“夫人参政”的传统。这在以后的中国地方政治中有很大发展，家族利益日益凸显，形成了家族政治。

其三，每一个派别都以一人为中心，强调对领袖（领导）的忠诚、绝对服从。像刘格平在文革中那样大搞个人崇拜，王谦那样经营独立王国，都显示了个人集权的特征。

其四，这样的独立王国又是有限、脆弱的，不可能发展成阎锡山那样的“山西王”。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度统一的领导下，是不可能出现地方军阀势力独大的局面的，对地方官员中央拥有随时调离的权力。刘格平、王谦的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但事实上又不能彻底解决，刘格平的势力后来都被王谦保护下来，成为他的干部，这都显示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地方集权的复杂性。

其五，因此，如何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就成为地方政治的最大问题。文革时期的这

些山西帮的做法主要有二。一是千方百计在中央寻找支持和后台，刘格平被毛泽东选中，王谦对中央文革派的投靠，谢振华认真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等等，都表现了一种本质上的依附性。但另一面，又是对毛泽东、党中央的部署、指示，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实用主义成为文革地方政治的基本伦理。

其六，在对上依附的同时，是对下的专制。文革中所有的山西统治者，从卫恒，到刘格平，到张日清、谢振华，到王谦、陈永贵，以及最后的李立功，对自己的反对派，不同意见者一律实行残酷镇压。暴力成为文革地方政治的最重要的特征。

由以上六个方面特点形成的文革地方政治，是建构性的，它既是文革前的地方政治传统的延续，更在文革中有重要的自觉发展，最后成型，形成一个基本模式，基本格局，就对文革后的山西地方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所揭发的山西“塌方式腐败”，显然是文革建构的地方政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恶性发展。

二、文革中的军队干政

一切听从党指挥的军队，显然是党的领导的坚强后盾，共和国统治的基石。但在文革前，军队主要担负保卫国家的使命，基本上不介入、不干预国家内政。这种情况，在文革时期有了根本的改变。毛泽东先在1966年12月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¹接着，1967年1月在准备发动“一月革命”，开展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明确指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部署，军队缺乏足够思想准备，再加上军队从来以维护既定秩序为本职，具有先天的保守性，现在要他们来支持打破既定秩序的造反派，在认识上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开始时大都持观望态度。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是最早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的军队干部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如前文所说，毛

¹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谈话》（1966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²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67年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97页。

泽东后来选择山西作为夺权的突破口，军队的支持是一个关键因素。张日清为首的山西省军区也就成为全国军队支左的一面旗帜。从此，军队就深度介入了山西文革运动，成为山西文革的一大特点。而这样的贯穿山西文革全过程的军队干政，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参与夺权”。其实，最初山西省军区党委的绝大部分常委都不同意支持刘格平的夺权，是张日清力排众议，坚持军队参与。后来张日清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经验说：“在联合夺权过程中，解放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省委内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同革命派结合的时候，我们便主动同他们联系，支持他们站出来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给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同时向革命群众介绍他们的情况，揭露敌人造谣挑拨的阴谋。清除革命群众对革命领导干部的某些怀疑和不信任情绪。这样，就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夺权以后，又积极参与了刘格平对反对夺权的造反派组织的镇压，在支左中以支持不支持“一·二一”夺权来划线。¹

但张日清与刘格平的联盟，军队与新政权的“蜜月”只维持了两个月。在刘格平制造“四·一四炮轰事件”以后，张日清在革委会内部的分裂中，又站在了刘格平的反对派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这一边，因为他也主张革委会成立后，应着力恢复秩序，而不再“继续革命。”他也因此和反对“一·一二”夺权的造反派中的温和派红联站结成了联盟。²这样，张日清就带领着省军区深度介入了山西省革委会成立后的干部与群众中的两派，即挺刘派与反刘派的斗争，并在事实上成为反刘派的领袖，从而形成了军队与革委会（地方政权）的对立，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1967年6月上旬，在中央文革的督促下，中央军委任命刘格平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这又激发了省军区内部的矛盾。张日清的反对派、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就公开扬言：“从今天开始，谁反对刘格平同志就是反对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谁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228页，第159页。

²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229——230页。

就是反革命”。张日清与刘格平、省军区与省革委会的矛盾，实际上是反映了军队与中央文革派的矛盾。因此，当中央文革趁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之机，掀起反军浪潮时，张日清和军队也就成为刘格平的重点打击对象。在前文提到的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决议上点名批判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刘格平迅速发动了“八月大扫荡”，军队首当其冲。在省革委指令下，激进造反派组织到各专市大抓“张日清的黑爪牙”，砸抢了全省90%以上的各县武装部，从武装部部长到普通民兵战士，全都成为揪斗对象。仅晋中一地，被揪的军分区、人武部干部达223人。全省95个人武部，被冲砸者达89个。¹可以说，山西的解放军的地方武装系统在省革委的指使下，基本被“歼灭”了。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但政治风云突变，在1967年底召开的又一次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上，又大批刘格平在山西搞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反军乱军的错误，并决定成立新的山西省军队的支左领导小组，由早于1967年2、3月就调驻山西的野战部队69军副军长谢振华为组长，张日清为副组长。如前文所说，从此，山西省的文革就有了两个领导中心：谢振华领导的省支左领导小组和刘格平领导的省革委会，从省城到地市县，甚至各单位，他们各支持一派，各占一方，就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政权。山西军队对文革的介入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形成了山西文革的新形态。一为“武装割据”，一是“局部国内战争”。本书对此有如下描述：“文革中的武装割据，不像井冈山时期类似山大王式的割据，也不像军阀混战时期的地域性的割据”，而是“一分为二”式的割据：“先是一个单位分成两半，各占一座楼或几座楼，修成堡垒，成为各自的据点。大一点的单位，还有中立区，在中立区谁也不打谁”；“后一些时候，一个城市分成两半，或三份。区域内势力强的一方联合起来打走了弱的一方，弱的一方又投奔自己一方势力强的区域。这样就在城市内形成了区域割据。区域内各单位形成联防，防备对手的侵入。被赶走的一方则积极策划，随时准备‘打回老家去’”；“再后一些时间，小的城镇，强的一方干脆把弱的一方驱逐出城镇，自己独霸天下，被逐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231页，第302页，第332页。

的一方则在农村一边打游击，一边积蓄力量，时刻准备复辟”。这样的武装割据发展到极端，有些地方就形成了“跨县跨地跨省的联合作战，作战规模达到了千人以上的水平，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门，有三八大盖、七九步骑枪、七六二步枪、美国大鼻子步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筒、六零炮、土坦克，直至榴弹炮。真正形成了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说起国内局部战争中的武器，本书有这样的概括：“没有枪，没有炮，解放军那里‘抢’”，“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没有枪，没有炮，我们民兵自己有”。这里说的是，支持刘格平、反军派的激进造反派或接受刘格平私自发放的武器，或袭击军队、人武部、公安局明目张胆抢枪；而拥军的造反派则从军队武器库“明抢暗送”获得武器，他们还得到武装民兵的直接支持。同时两派也都利用军工厂、钢铁厂、机械厂的支持者自己制造武器。最后，在晋中地区，就由地革委组建八县联防军即所谓“晋中野战军”，其指挥者与参加者都是退伍军人，和军队支持的民兵武装对抗，进行“正规化”战争。这都创造了文化大革命的奇观。这样的由地方政权与军队支持、发动的“内战”，造成了大规模的伤亡，使山西又回到了“战争年代”，事实上许多参战者就是当年抗日游击战的老兵。¹文化革命的武化，最后演变为战争，这正是让军队参与的必然结果。

而这样的局部内战是遍布全国的。发展到1968年7、8月，面对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两派武斗，毛泽东发现造反派（无论是激进造反派，还是温和造反派）都已经失控，决心将红卫兵、造反派赶下历史舞台，结束文革群众运动。他的办法，一是派出工人宣传队，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一是实行军事管制。这就是毛泽东在7月28日深夜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所说：“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要包围起来，就是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²随后发布的，专门针对山西武斗问题的《七·二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406页，第407页，第408页，第409——410页，第414——415页，第416页，第417页，第421页

² 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转引自聂元梓：《聂元梓回

三》布告，就明确规定：“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已负责主持山西全面工作的谢振华立即调集了二十多个团的部队进入山西各地、各大单位进行军管，并对造反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镇压。尽管或许如本书作者所说，山西的清理相对温和，没有造成广西大镇压那样严重后果，但动用军队管制来结束文革群众运动，还是全国统一的部署。¹

无论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动用军队干预地方、国家政治，用军队镇压群众（政治反对派，不同意见者，不顺从者），将军队作为贯彻执政党（甚至是执政党中的某一派别）的意志的工具，还是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对此后中国政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三、文革中群众的分化与觉醒

以上讨论强调了文革中地方干部与军队的突出作用，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群众在文革中的地位与作用。

其实，首先起来造反，打破既定秩序的，就是普通的学生、工人。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所说的“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北京公社宣言”的聂元梓等人批判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三天，山西部分大学陆续有了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到6月6日，山西省政府的门口旁边的西墙上就出现了《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山西省委：这些都是党中央直接号令下，群众的自发响应。

但随之而来的省委在教师、学生中大抓“右派”，这才把群众“逼上梁山”，开始有了自觉的反抗。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公布，提出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以后，从1966年8月开始，

忆录》，第303页，第295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479页，第481页，第487页。

山西各校各类群众组织就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并根据对省委的不同态度而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别。属于造反派的组织到10月就联合成立了以大学生为主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同月，又成立了以中学生为主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工人造反组织“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11月，山西当时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也宣告成立。此外，还有两支由省委、省人委干部为主的造反派组织：“七一公社”和“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这些造反派组织成立后，多次冲击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组织与省委书记的辩论会，召开“控诉以卫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斗卫（恒）王（谦）王（大任）大会”等等，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它们后来在山西文革中的地位 and 作用奠定了基础。具有保守倾向的组织，如红卫兵中的“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工人中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等，相形之下，影响就小得很多，后来都很快退出了山西文革历史舞台。¹

以上这一段文革初期的造反历程，和全国其他省份都大同小异。真正构成山西造反派历史特点是在山西夺权，成立省革委会以后老造反派的分化。首先是对“一·一二夺权”的不同态度：决死纵队、兵团等参加了夺权，红联站则持保留和反对态度，没有参加夺权（但其下属或关系密切的组织，如红联站太工永红、捕猎大队、太原市委红旗参加夺权，总勤务站也不制止），理由是：省委主要领导有严重问题，“但是否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足够材料支持，还在审查之中”，没有理由贸然夺权；“是否夺权，怎样夺权，夺了权由谁领导。只能由中央决定，中央任命，群众参加，不能由某几个当权派自行宣称”，因此“提醒全省人民要谨防政治扒手浑水摸鱼”，他们实际上对刘格平等是不信任的。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即便是夺权，也应该由红联站牵头夺权”。²本来，在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因而有不同态度，是正常的；但刘格平等在夺权成功并进而掌握了山西党政大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73页，第77页，第83页，第84页，第86—88页，第90—95页，第86页。

²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133—134页，第113页，第126页，第128页。

权以后，就把对夺权的态度视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甚至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并以此划线，将支持夺权的造反派视为依靠对象，并进一步把它们组织起来，成立“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总站”），作为自己的基本队伍；对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造反派，如红联站及其附属组织，则进行有意识的压制以致无情镇压。正是在刘格平为首的省革委“以我划线”的分化政策引导作用下，山西老造反派发生了严重分化：以红总站（包括决死纵队，兵团等）为一方，红联站为另一方（后来兵团与红联站又有了合作），山西群众就把它们简称为红总站（“红字号”）与兵联站（“联字号”），这样的两大派的对立，贯穿了“一·一二”夺权后的山西文革的全过程：以后，省革委会内部的分分合合，干部的上上下下，造反派群众组织都分为两派：一派始终支持台上干部，从刘格平到继承其衣钵的王谦、陈永贵，一派则始终抵制他们的统治。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军队的不同态度，由于山西的军队除夺权时期与夺权初期和执政者有良好关系外，无论是张日清领导的省军区、人武部，还是谢振华领导的69军都处于和革委会干部对立的地位，因此，造反派组织也自然分为反军派与拥军派。这样，两大派的分歧就集中表现为：拥刘（王、陈）和“反刘（王、陈）”，以及相应的反军（张、谢）与拥军（张，谢）。这样的分歧，在开始时是有各自的理由的：拥刘（王，陈）反军，是因为支持他们所执行的中央文革派的“不断革命”的激进路线；反刘（王，陈）拥军，是反对中央文革及其地方代表的激进路线，而支持军队执行的得到周恩来支持的“稳定秩序”的温和路线。因此，这可以说是在夺权以后发生的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分化。这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山西的特点是激进造反派参与掌权，温和造反派是革委会的反对派，却得到军队支持。有的省份就不是如此，比如同样是夺权较早的贵州，掌权的是温和造反派和原来的保守派，并且始终得到军队的支持，因此，他们也是拥军派；激进造反派因为认为夺权后产生的革委会“换汤不换药”，继续镇压群众而对其持保留与反对态度，他们也因此受到新政权与军队的双重压制和持续镇压，直到文革后期才得到换防贵州的野战部队的支持。这里，革委会——军队与激进造反派——温和造反派之间，在不同省份、地区的具体关系的不同，

是显示了文革的复杂性的，应该作具体的分析。

造反派由于意见、主张，对革委会与军队态度的不同，发生分化，也本属正常。问题是，在文革中，就把这样的分歧、分化，通通纳入所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轨道，变成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消灭一个的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在认识上也陷入了把自己的主张绝对化，甚至真理化，将一切不同于己的意见妖魔化的误区，以及非正确即错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提出“文攻武卫”的极左口号指引下，两派的派争，就由文攻变成武斗，最后发展为前文所说的武装割据与局部内战。这里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群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以致分化，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只能用民主讨论、协商，相互妥协的办法来解决，绝不能变成你死我活的搏斗，更不能付诸暴力。

群众之间分歧与分化的产生，在观念、主张的背后，确实存在不同利益。问题是，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奉行的是“有权就拥有一切，无权就丧失一切”的权力逻辑，两派的意见之争，最后就变成围绕夺取或维护权力的纯粹利益之争。前文说到，权力斗争是文革地方官僚政治的最大特点，最终文革群众政治也必然为官僚政治的逻辑所渗透与支配，文革许多群众组织的领袖都逐渐政客化，这恐怕不是个别现象。毛泽东曾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为解决山西两派联合问题就办过多次学习班。1969年8月“七二三”布告后举办的那一次，把八千多名省地县大小头目和干部，全部调离本县本地，进京长住“中央学习班”，戏称“8341部队”。在这一次和此前历次学习班上，为谋求本派利益，两派头头都要尽政客手段，周恩来用八个字概括：“上下派战，阳奉阴违”。两派都学会当年毛泽东重庆谈判的办法：“上谈下打，假谈真打，边谈边打”；对学习班上中央首长的讲话，断章取义，各取所需；达成的协议也“说了不算”，毫无认真执行的诚意，有人说：这是“两派合伙一起糊弄毛泽东和党中央”。¹这样的政客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造反派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424——425页，第428页。参看赵瑜：《群虎入京笼——山西文革的历史片断》，《领导者》2015年第2期。

的异化，其中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但在另一面，仍然有坚守与新的觉醒。如前文所说，造反派的最初造反，或出于朦胧的革命的理想，或者因为受到了压制近乎本能的反抗。总的说来，他们的造反是建立在対毛泽东、党中央的信任甚至迷信基础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他们的觉醒就必须从打破迷信开始。文革正是给这些底层的造反派，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人物或骨干，提供了一个接触上层的机会，就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红联站的头头李青山在参加了七月会议目睹康生、关锋这些中央文革的“大首长”如何在“上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们怎么能跟得上呢！”终于看清：“所谓文化革命，所谓群众运动，完全是他们这些大人物定好调调，运动群众！”结论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无法搞，也不能搞！”¹这是一个深刻的观察，是抓住要害的；文革的本质就是“运动群众”。看透这一点，就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主：用自己的眼光重新观察一切，用自己的头脑重新思考一切：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觉醒，也可以说是觉醒的起点。

而且这些革委会的反对派，当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被打到社会的底层，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首先是因此获得广大市民的同情与支持。在1967年9月5日，当刘格平调动7万人包围困居在太原十中的七一大楼的红联站造反派时，数千名被称作“马路兵团”的群众自发站出来保护革命小将。他们中“有街道个体工商业者，有各企业中原来的大量中间分子，有小集体和街道工商企业的职工，有基层街道办事处的下层干部，甚至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半大小子”，他们大都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未必有多么明确的政治主张，但确实反映了“省城民心的向背”。²这对这些小将的意义，不只是鼓舞了士气，更使他们因此与普通民众建立了深刻的精神联系，站在民间底层社会的立场来观察、思考文革，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对这一代人的成长，自然是非同小可的。

而且不可否认，这些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在革命风暴中的摸爬滚打，虽然付出了惨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306页。

²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341——342页。

烈的代价，却也受到了磨练，见了世面，不仅锻炼了精神意志，也增长了实践才干。在1970年左右被逐出文革历史舞台以后，他们中有些人到了农村插队，有的担任了一定的基层领导职务，这都使他们真正接了地气，了解了中国国情。由此而形成的现实关怀、民间情怀、底层眼光，意义与影响或许是更为深远的。

应该说，到了文革中后期，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发生了更具实质性的分化：有的依然沉浸在造反的亢奋里，为自己的信念坚持战斗，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地挣扎在革命的漩涡中；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退出运动，成了逍遥派，有的陷入颓废，有的则另找出路；其中就有为数不少的人，转向“地下读书运动”，广泛寻求精神资源，追问文革问题，思考更根本的问题。特别是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更多的人对文革产生怀疑，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许多后人称为的“民间思想村落”，就这样陆续出现。这样的民间思想村落是遍布全国上下的，地方的中下层的讨论，因为“天高皇帝远”，就格外自由而开放。本书着重介绍的“张赵反革命集团”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张赵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都是红联站的头头和骨干。“张”即张珉，文革初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生，曾被推为红联站总勤务员；“赵”即赵凤岐，太原化肥厂工人，被红联站推为山西省革委会委员；张、赵都是红联站中的强硬派的代表。被视为张赵集团的理论家的张耀明是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在1971年——1972年间，他们大都集中在太原化肥厂，下班后聚集在张珉宿舍谈天说地，妄议朝政，即工人们所说，“一编就编到了政治局”，因此被戏称为“裴多菲俱乐部”。以后，因为意识到中国党内将发生大斗争，一场大变革正在临近，渴望自己能投身其中，“在未来的大风浪里当弄潮儿”，就酝酿着成立组织，并加强了对外联络。在与所谓“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央委员会”有了联系以后，就成立了太原支部。结果被人揭发而被全部逮捕，被视为反革命大案。据说江青还作了批示：“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要尽快查处，并追出黑后台。”¹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赵集团的出现，确“有预谋”：如前所讨论，这是这些温和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637——638页，第640——642页，第644页，第626页。

造反派中的急进派，经历一个漫长的逐渐觉醒的过程，最后必然作出的选择。同时，他们也确“有纲领”，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独立自主性，这也是标志着文革造反派的真正成熟的：他们因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造反，最后把造反坚持到底，就开始走出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思想与路线的怀疑者和批判者。

这就是保留下来的具有纲领性质的张耀明 1974 年所写的《论现状》的主要价值所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九大以来“党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执行了一条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极左路线，可以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目前现状的总根源”。应该说，从局部性的怀疑、不满和抵制，到明确提出全局性的根本路线问题，这是一次思想的飞跃。

而且更有理论的批判。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阶级斗争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所谓“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生产发展的唯一源泉”都是“脱离实践的空洞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这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章尖锐地提出了文化革命发展到极端的个人崇拜，破坏党内民主的问题：“党内民主权力高度屈从于个人权威之下。以我划线，把个人和党看成同体，反对派一发表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帽子”，“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随意）超越党章行事”，就有可能“把中国变成封建帝国式的国家”，那就是真正的“复辟”。这都点中了文革中国政治的要害。

文章更集中批判了文革经济路线：“认为只提高觉悟就会使生产力上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那可谓是最大的唯心主义理论”，“脱离农民每天最迫切的肚子问题，去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说穿了是搞鬼”，“不愿承认物质奖励能激发生产积极性”大搞“突出政治”鼓吹“精神万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的自欺欺人”。可以看出，这些批判都是从第一线的生产者工人和农民的立场与眼光出发的，因此，文章反复指出，“在生产队所有制下农民干劲不如干自留地高，集体粮长得不如自留地好”，“工人并不同意绝对平均

主义的分配方式”，“工人的积极性普遍不如过去高”，强调“只有我们在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超过帝国主义时，资本主义复辟才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经济政策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

文章对文革反知识、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路线同样进行了尖锐批判：“我们是在消灭知识和科学的基地。完全压抑了知识分子发挥自己长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意用愚昧来改造知识”。¹

这确实确实是对中央文革派所执行的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全面批判，对这些曾经紧跟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冲锋陷阵的造反派是一次思想的大决裂，大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他们参与文革的最大收获。我们在前文说到，文革的最大作用与影响，就在于使每一个社会阶层、利益群体都自觉到自己的真正利益、需要所在，自觉地去追求自己的权利。如果说这些造反派，青年学生、工人和普通干部，他们最初投身于文革时，多少有些盲目，并不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与追求；那么，现在经过文革的血与火的磨练，他们终于明白，自己需要和追求的，是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生活的平等，民主，个人的思想自由与独立。应该说，到了文革后期，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的共识。这就为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还有文章显示的它的作者的精神面貌和状态：对现实、现状的强烈关怀，“革命的批判精神”的坚守，高度的理论自觉，²以及前文所论及的底层情结，与普通工人、农民的精神联系，这都显示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的可贵的精神素质。这也应该是文革付出的巨大代价得到的重要收获。这其实是为文革后必然发生的中国改革作了人才、干部的准备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新的历史变革的依靠力量。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了另外两位红联站的领军人物段立生（山西省委党校政治系学生，曾被红联社推为省革委常委）和李辅（山西省委政研室干部，曾作为红联站观点代表进入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 647——648 页，第 657 页，第 450 页，第 654 页，第 651——653 页，第 655 页，第 649 页。

²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 464 页。

山西省委)，他们在1970年造反生涯结束后，曾到生产队插队，以后又担任过公社、县委领导，对农民、农村的实情有了深切的了解，就对极左路线作了自觉的抵制。段立生还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在报上发表文章，在核算单位、自留地、农副业关系、粮食征购等农村重大现实问题上，对极左路线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并且进行了理论的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离开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员群众的觉悟程度，主观地出点子，办事情”，这都触及到极左路线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¹像段立生、李辅这样的经过文革锻炼，有了反思和觉醒，自觉抵制极左路线，具有理论准备与实践经验的青年干部，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改革开放的动力与依靠对象。

但中国的现实却是：理所应该，却并不当然。这些经过文革的考验，又对文革有了反思，终于觉醒的真正的改革力量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被作为“三种人”被打压了下去，而且几十年不得翻身。这样的改革开放“理所当然”的依靠对象成为“理所必然”的打击对象，是中国特色的改革的一大怪事。“理所必然”还是源于我们在本文中一再讨论到的问题：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都从文革中吸取了教训，并决定了他们以后的行动。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从文革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必须把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绝对权力放在第一位，即使提出和接受改革开放，也是以维护自身的绝对权力为前提。因此他们对曾经从自己手里夺权的造反派，是心怀深仇大恨，必定报复的；对也是总结了文革的教训，变得更加独立，自觉追求自己的民主权利的觉醒的造反派，更是不放心，他们需要的是永不觉醒的驯服工具。对觉醒的造反派的打击这一事实本身，其实是显示和预伏了中国式的改革的一个根本矛盾的，以维护既得权力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问题，带来严重后果。不过，这已经不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我们的讨论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2016年8月22日——9月3日

¹ 《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第549页，第557页，第553——554页，第556页。

【书讯】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在海外出版

续霜红

宋永毅主编《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2016年5月12日，国史出版社（美国）出版，共18册，每册分两卷，共三十六卷。此书原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3月，内部印刷。

内容简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广西壮族自治区是这场内乱的重灾区。广西文革中以所谓正确路线的名义，大搞派性镇压，造成全区冤假错案20万件，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达85000多人，文革结束后很长时间，由于以派划线用人提干，各级领导岗位上有很多人抵制清理和平反，迟至1983年3月，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督促下，广西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工作，全区共组织了10万人的“处遗”队伍，历时四年多时间，（1984年后“处遗”结合整党工作进行，直至1987年7月基本结束）。平反冤假错案，追究部分人的政治和刑事责任，全区共处分了53000多人，其中国家干部18000多人。

1987年，广西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把全区各地、市、县在“处遗”中形成，并经当地党委审定上报的“文革大事件”材料以及该办公室编写的《广西文革大事件》、《广西文革大事记》编印成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腥风血雨，巨细靡遗，堪称一份最翔实、最完整的十年浩劫史料，而其“官方身分”更使其拥有了无可质疑的权威性。

从这本难得的史料，我们既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如何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入深渊，又可以看到文革如何释放人性中的残忍和丑恶，将山清水秀的八桂大地如何变成肆无忌惮地奸淫烧杀，活埋灭门的人间地狱。

总目录：大事件部分分十八册，一册玉林、南宁地区，二册梧州地区，三册百色、桂林地区，四册柳州、钦州地区，五册河池地区，六册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市和柳州铁路局，七册区直机关、自治区，八册南宁地区，九册柳州地区、柳州铁路局、梧州市，十册桂林地区，十一册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地区，十二册玉林地区、北海市，十三册南宁市、钦州地区，十四册河池地区，十五册百色地区，十六、十七册区直机关，十八册区直机关、自治区。

全书前言：何频：《留给后人难以理解的历史》

全书序，宋永毅：《广西文革中的大屠杀和人吃人的惨剧》，分四个部分：

1. 规模和数量：史无前例的吃人风潮；
2. 国家机器行为：吃人的杀人犯和策划者们；
3. 进化和返祖，在人性和兽性之间；
4.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览表。

原编者前言：

一．中共中央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关于进一步处理好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

二．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会议纪要；

三．中共中央对《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的批复；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五．陈辉光同志在整党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关于档案工作部分）。■

【文摘】

赵瑜和他的《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

朱竞

2008年的春节前夕，作家赵瑜送给我一部很重的大书《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之所以说它是“很重的大书”，它实在是太重了！重得让我要准备足够的力气来拿着它。我知道，在这部书中装载着无数位有名和无名的文革期间的牺牲者；装载着数不尽的血泪记忆；装载着一代人对历史的真实讲述；装载着一幕幕荒诞的故事，装载着文革亲历者对历史的忏悔和反思，装载着后人及旁观者的品头论足；更装载着作家赵瑜一份重重的责任：“他告诉我们当下的人们，文革中不同形态的牺牲者们，为了后人的警醒，为了民族的进步，而死去而悲伤。我们永远纪念他们。”

然而，为了纪念，我们必须了解真相，才能牢牢传记。

《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是作家赵瑜用了几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赵瑜意识到，写作这样一部史志性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他的一个夙愿。

我写此文的目的确“是让大家知道赵瑜写了这样一本书”。文革爆发至今，竟已四十多年。和全国一样，他所出生的山西上党地区，文革故事只能愈加悲惨和壮烈。同时他更清楚地感到，要写好那段历史，困难非常大。而当下面临着许多文革的亲历者，或年老多病，或已去逝，如果不及时抢救采访，我们这个时代将会失去太多真实的东西！

于是，赵瑜立即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遍寻当年太行风云人物，突击采访了一年多时间。赵瑜的《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以一个地区为基础，全局性地展现那场酷战的真相。同时让他困惑的是，他在写作中没有诸多的文革书籍可以借鉴。所以赵瑜说：“我的写作也是试验性的。”而在写作之初，赵瑜就清醒地意识到“要顺利出版这部书，其困难，要比写作这部书还要大。”

我手中拿到的是赵瑜自己装订出来的一百本样书，他是送给朋友们征求意见的。而每送出一本书，他在书的封面上都要写上编号，我的这一本为“零叁叁号”。打开书的折口处，有这样一行字：“1966—1969，感谢为了文革记忆而真诚地接受采访的人们！”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是一部未定稿，请多提意见。”赵瑜的这一举动很让我敬重。他作为一名公共的知识分子，自觉有义务把那一段历史真实地呈现给后人。

这部大书，读得我很辛苦、很沉重、很忧伤、很悲愤、很无奈！

《牺牲者》共分出了19章，每一章里又分出五六小节。“最先罹难的人们”、“是谁杀了王尚志”、“魁首出山风雷动”、“势均力敌两阵营”、“七月会议如战场”、“从肉搏到冷兵器作战”、“太行山上第一枪”、“刘格平上太行”、“难民跑城”、“参谋战后勤战与政治战”、“伏击在元月十六”、“兵发太行”、“血肉横飞大爆炸”、“八县联军克上党”、“五县合围战高平”、“血火四新矿”、“虐杀生命”、“处决在战场之外”、“决斗在中央学习班”、“回眸风雨十七年”……

读的过程中，我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惊心动魄！让人真的不敢相信，那些场面和故事都是真的吗？

“一场旷日持久的文革大战发生在1966年至1969年间，杀伤了许多生命，却全然不为后人所知。翻检当代史册，遍寻不见这场炽烈炮火的记忆，激战流淌出鲜血来，浸染了我们的少年时代，数十年未能褪色。尸体横陈残肢飞舞，是伴随我们一代人成长的映像，扭曲我们残破心灵永不康复。”

在赵瑜的采访中，有大量珍贵的原始材料呈现在其中。现在看来，这些真实的材料中所发出的声音是那么的真诚和荒诞，读着非常可笑。其中也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文革语言！

在下面这样一个小节“追悼亡灵与徐公达惨案”中，描述了一个大型追悼会的场面，有三万多人汇集在英雄台的广场上，全副武装，沉痛哀悼“联总”组织在长治市区战死的战友。主祭人在一片气氛肃杀、哀歌阵阵中宣布大会开始。他说：“……炮火连天鏖战急，

今天我们在这里声讨红字坏头头的法西斯暴行。胜利的号角声中，我们无法忘记牺牲的战友，他们在牺牲的最后瞬间，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他们把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红色政权，献给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给了伟大的文化革命！万恶的坏人妄图用武力征服我们。他们的屠刀只能杀害人们的躯体，却永远毁灭不了我们的赤胆忠心。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战友站起来！”主祭人的话后，更煽情的正式悼词，才是一篇极具文革代表性的派战祭文。这样的语言，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滑稽可笑。

这样一部反映文革的纪实作品，会给读者提供一份很翔实的资料，同时也会让更多的人去反思文革给中国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近些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在反思和批判文革的一些错误思想。在我看来，简单的否定和批判文革是容易的。对文革采取某种坚决的拒绝和厌恶的态度，也许可以证明批判者的鲜明的道德立场，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简单的和粗糙的道德批判。这一切并不能帮助我们抵消文革给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深入研究和了解文革的发生和运行的机制，就不能够真正有效地识别其种种迹象。在今天，我们彻底否定了曾经发生过的文革，难道我们就能够说文革从此永远成为过去了吗？

赵瑜《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考课题。■

此文选自朱竟的新浪博客。朱竟是资深编辑，著有《文学后台》（作家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该书是朱竟近来的散文、随笔、人物素描、评论等文章的合集。

【编读往来】

1. 80后、50后、30后及外国学者谈纪念宇锋

❖ 80后留法博士眉间尺谈宇锋

《李宇锋纪念专辑》是我自三年前开始读《记忆》以来最为沉重的一期。虽然我也和李宇锋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并从一些文革主题的文献综述中对《往事》有些模糊的印象和粗浅的认识，但对宇锋先生为何创办《往事》、在推进民间文革研究中做过哪些具体的事情并不了解。通过第180期《记忆》他的同学、朋友、知己和文革研究同道中人的回忆和照片，一点点拼凑，宇锋先生的过往，慢慢变得清晰起来。这世上竟有如此可敬可爱的灵魂，而如今的年轻人还未曾了解，便与他错过了！

宇锋先生1981年读北大时，我刚刚出生。他2004年发表第一期《往事》时，我刚大学毕业，也曾在北京停留过一段短暂的时光，那时还对未来茫然无措，不知将走向何方。如今，我也和宇锋先生一样，走上了这条文革研究的“不归路”。从对中国当代史的认知仅限于历史教科书，到带着诸多疑问开始捧起史料认真研究和阅读，经过了十年时间。思想或许不能结束痛苦，但与事实为伴，不带成见、尽量客观地去观察历史，设身处地去感知和还原那个时代，方能了解中国是如何行至今日，而我们这代人又是从哪里来。

在阅读文革史料时，我也常常思考什么是死亡，什么又是永恒？宇锋虽然离开了，但他的文字还在，他的思想还在，134期《往事》通过网络，如吹散的蒲公英，已播种在众人的心田。文革研究兴盛日，家祭勿忘告宇锋。■

❖ 50后学者赵群：《记忆》应该担负起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看180期“李宇锋纪念专辑”我想到一件事：作为“非主流”的一个平台，贵刊应该担负起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那些“非主流”中的杰出人物（如李宇锋）；和卓越的独立学者（如高华）树碑立传——宣传他们的事迹，介绍他们的著作，传播真正的“正能量”，以发扬光大他们的精神。

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纪念专辑是一种；还可以开个专栏，专门刊登介绍这些人物的文章。贵刊要有一种历史的自觉：天降大任于《记忆》，《记忆》应该自觉地成为悼念逝者的“竹厅”，自觉地成为独立学者的网上纪念馆，像台湾二二八“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一样，自觉地成为毛时代的弱势群体——那些被侮辱被迫害被耽误的“政治贱民”的纪念碑。■

（五年前，我到台湾，特地到台北总统府前看了来信提到的台湾“二二八”受难者纪念碑。我还抄下了整个碑文，记得碑文结尾处是这样写的：“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纪念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编者■）

❖ 30后 退休教师 昭明、翔雁（美国）谈宇锋

180期李宇锋纪念专辑收到，匆匆速阅一遍，感触良多。过去对此人和他的主持的刊物《往事》均无了解，但读后对其人崇敬之情悠生。对一名文革时期还是孩童的他，对文革（实际是对建国以来的）的历史能有这种认知、见地和担当的人，应当说是不多的。他的故去是国人的一大损失，若可能，请代带我们向他的家人、亲人表达深切的哀悼和敬意，请他们节哀保重。

我由此想到，为抢救文革历史，不仅要请那些参与者注意自身的健康，让后人能有足够的时间，从他们的身上把历史的真实留存下来；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不断提醒众多参与抢救工作的献身者们珍重身体，节忧节劳，否则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工作负担下，铁打的汉子也是要累垮的。■

❖ 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谈宇锋——

我和李宇锋先生只见过一二面，可是对于他的死，我是非常悲痛的。他给我的印象非

常深刻，不易遗忘。外国学者所办的 pre-history 网址，不是把国内的若干电子刊物都上载了吗？为了找齐李先生办的那个《往事》电刊的各期，并且在他的同意之下全部上载于我们网址上，我于 2015 年还专门找过他（线是唐少杰拉的），他同意了，并且给我发了如下的 email：

迈克好！

从命呈上，请指教！仁兄高见十分符合我党“政治正确”要求，足见“天朝教化，无远弗届”。你我中西原版学者（及非学者）共同响应□主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号召，清除盗版历史雾霾，实现“中国梦”指日可待！呵呵。保持联系，随时候教！

宇锋 2015 年 3 月 19 日

后来《往事》从创刊到末刊（请注意：《记忆》这次刊载的目录不全，期数应为 128 而并非 117！）都统统以 PDF 的型式载于 <http://prchistory.org/past-events/> 还为了介绍李先生编印《往事》一事还写了一个简短的英文的“刊物介绍”，全文如下：

The History of Past Events

Past Events (《往事》) is an electronic not-for-profit journal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04. Like Remembrance and Yesterday it publishes mainly (but far from exclusively) writings o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reminiscences, critiques, case studies, longer and shorter pieces, some by famous figures others by not so well-known writer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Past Events has for over a decade been Li Yufeng (李宇锋), an energetic wheelchair-bound businessman, promoter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d much respected affiliate of the communit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ia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oughties, Li more than once helped organize informal mini-conferences in Beijing devoted, for example, to critiquing a recently published book or debating a controversial trend in scholarship. Some of the minutes from, and papers presented at, those very lively gatherings subsequently appeared in Past Events and other Chinese “under-the-radar” electronic journals. (See for example Past Events issue No. 101 below in which Chinese historians engage critically with Mao’s Last Revolution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The scholarly aim of Past Events is spelled out in a programmatic statement in issue No. 1, jointly signed by Li and historians 郑仲兵 (formerly with the CCP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and 田晓青. It reads as follows:

《往事》的宗旨是尊重历史，就是不为利害、好恶而歪曲、编造、增隐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关心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遭际，并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重新评价；它将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对探究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们的交流平台。他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The current (winter 2015) publication status of Past Events is not entirely clear, but when new issues appear, they will be posted here in the PRC History Group’s Electronic Journals Archive. The altogether 128 issues that appeared between 2004 and 2014 are available in PDF-format below. ■

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

2. 老赵谈“方答读者”

方君大作“答记忆读者”我认认真真地读了几遍。总体来说，我觉得方君已将《记忆》的来龙去脉梳理得一清二楚，对其未来的命运，也做了展望性的估计。无论结局是悲观，还是乐观，方君拳拳之心令我感佩！对方君力主推行会员制的做法，我亦感很有道理，在眼下尚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的前提下，会员制理应施行之。

然而，遗憾的是，方君在谈到维系《记忆》能够生存并有所发展的经济基础问题时，否定了朋友们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后，即语焉不详。办刊经费究竟从何而来，依旧是个悬案。而我以为，这个问题有必要深入地探讨一下。

我看好印红标先生提出的建议，觉得具有可操作性。方君以这样做涉嫌“非法经营”而不予采纳。就此我特地请教了法律界人士，得到的答复是，经营和集资等经济活动属市场行为，被定为“非法”的大前提是“以营利为目的”。如果是“圈”或“群”中的同道、同好，以自愿为原则，掏腰包凑点钱维持其存在，并搞点联谊活动，则称不上市场行为，更谈不到“非法经营”或“非法集资”。据我所知，眼下一些知识性、娱乐性的小网站，早就在网友中收取费用，用于网站的建设。我也早就注意到马悲鸣主编的《周末文汇》的做法，公布账号，另以附录定期公布捐钱者的姓名和金额，不过，这些钱的用途其并未公示。当然，该刊的编发似乎在境外，或可在另当别论之外做个参考。循着这个思路，《记忆》是否可以“试水”，请方君郑重考虑。还是套用那句俏皮话：有钱不是万能的，而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记忆》之为生存，亦兼盼长存，没钱将何以堪！

法律界人士还善意提醒，当局如果想收拾你，借口各式各样，但都有辩解或商榷的余地，而从经济上打开缺口，则是置你于死地的杀手锏。此话让我猛然想起查封《炎黄春秋》时的一幕，两名壮汉首当其冲，把住财务室的门口，连会计想拿个人物品都不得而入，哪管胡德华还在现场口若悬河地据理力争。有冷眼旁观的圈内明白人一语道破：“嘿嘿！财会上的审计，丁点儿漏洞都能让他们（指炎黄负责人）憋死在那儿，这单活儿出手老辣！”

当然，《炎黄春秋》是正式注册，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杂志社也可能是企业法人登记。而《记忆》与之没有什么可比性。这个插曲给出的提示是，账目务必一清二楚，丝毫的糊弄或马虎都可能授人以柄。■

- ◆ 老赵为本刊着想，令人感动。《记忆》打算分两步走，先解决眼前最要紧的人手问题，下一步再说收费的事。兹事体大，不敢造次。谨请老赵等朋友谅解——编者

3. 越人提议刊发简短书评

看了《记忆》上兄的回答，个人感觉对于《记忆》改为会员制的原因更为了解，也更能接受了，对于《记忆》的未来发展，排在第一位的应是“做远做长”。

刚看了新收到的《昨天》年初的一期，上面有文章介绍了2016年文革题材出版物的相关情况，列出了一份简明目录。这其实对于大家读书有很好的帮助，可惜从目录上只能看到简短的书名及出版的信息，一本书到底写的怎么样，有那些“独到之处”就付诸阙如了。想到《记忆》推行会员制之后对于各位会员提出的写稿要求，个人倒觉得写几篇简短的书评是大家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而且对于彼此的读书学习也不无裨益。书评的字数要求也可以低些，少的，三五百字即可，像《南方周末》最近发表的一些2016年读书感想，其中一本书的简单评述也就500字左右。愿意写的长些的，那就更好。■

- ◆ 越人所言极是，记忆需要书评，希望有能力的朋友，拿起笔来，把您认为值得说一说的书，告诉我们。另外，请把文章写短写，再短些。像越人所说，几百字即可。只要言之有物。——编者

4. 宋翔雁建议为回忆录提供平台

这期我先看了编读往来栏目，你们写的非常实在、坦诚，也让我们这些读者看到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到，出于对抢救文革史的担当，你们所做出的令人感动的贡献。我相信这段文字并不华丽、也无任何渲染的直白，既令人感慨，也令人敬佩。但历史终将证明，你

们的付出和艰辛必将得到后人的尊重和承认。

对于今后将实行会员制的讨论，前一段我没有发表意见，实乃出于所处环境的影响（身居海外，周边可以说很难见到一个华人或华裔），对刊物的发展很难贡献自己的力量（尽管自己也没有多少能力和水平），所以不想再多说什么，以免添乱。但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今天我想说一点：记忆作为一个抢救文革历史的平台（这对当前的中国，是极其重要的），在定位上一定要尽量照顾到广大文革参与者的文革回忆文稿。这些人作为一个普通参与者（拿过去陈伯达红极一时时曾说过的话“小小老百姓”来衡量，就属于小小老百姓中的一员），他们不可能写出什么揭发惊人内幕的史实，绝大多数也不大可能写出什么有深度、有见地的述评一类的文章。但他们却能过写出自己参与或看到的，文革进行过程中真实的“情景”和自身或亲人、亲友、同学、同事等的真实心情、议论和看法。后人看到这些真实的文字，是会冲破长期以来的舆论控制和灌输造成的历史遗忘，而了解到文革的真实而又有血有肉的一面。当然我也很赞同应当有一些高水平的评论，这可以提高刊物的知名度，但我觉得这是第二位的。而且我认为有些普通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当时学历史或社会学、文学的人们，有可能写出一些很有水平的评论文章（如过去登出过一篇北大学历史，现居美国的人，写的北大文革回忆）。

总之，任何事物（包括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为了刊物的延续（这样说不是悲观，而是尊重眼下的现实），我同意实行会员制。■ 2017.2.

◆ 旅居美国的宋翔雁先生以八十高龄，写出了三十万字的回忆录。《记忆》受惠连载，颇得读者好评。希望文革亲历者，都向宋先生学习。宋先生的回忆录竣稿后，《记忆》为了表示感谢，到复印社自印了若干本，一者送宋先生以示感谢，一者作为《记忆》的成绩，留为纪念。如果您能像宋先生那样，写出文革的经历，《记忆》也会连载，也会印书相赠——编者

5. 眉间尺谈美国总统图书馆的文革资料

作为文革研究的专门刊物，我希望《记忆》能为文革学者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有计划地介绍一下美国各类图书馆里关于文革的资料和藏书。上个月，我到美国总统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查阅中国历史资料，结果发现这里藏有非常多的关于文革的档案。

比如，我看到一份1975年的白宫记录——《美国总统助手 Paul Miller 访华的档案》，里面是米勒和美国总统的对话，描述与周恩来、邓小平会面，并提到邓小平在文革中差点没被杀死，档案后面美国总统还问到中国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从这么一份小小的档案，不难想见，如果中国文革档案开放的一天，会是什么景象，能给学术研究带来多少丰富的史料！只是现在不知道被保存下来还有多少。■

◆ 这已经不是窗子，简直是大门了。不过，这些资料都是英文的，要介绍给国内读者，还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有人愿意义务翻译吗？——编者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予庆 富田

本期版式：启之